全球對話 8.3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3期，以17種語言刊出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訪談Nancy Fraser

Christine Schickert

被挑戰的民主

Hauke Brunkhorst
Christian Fuchs
Andrea Silva-Tapia
Hlengiwe Ndlovu
Gerassimos Kouzelis
Haryati Abdul Karim
Esteban Torres Castaños
Amy Austin Holmes
Peter Wahl

紀念 Aníbal Quijano

Nicolás Lynch
Raquel Sosa Elízaga

面對貧窮

Joshua Budlender
Vassilis Arapoglou
Juliana Martínez Franzoni
Fabian Kessl
Mustafa Koç

理論視角

Sujata Patel

波蘭社會學

Marta Bucholc
Jan Czarzasty
Juliusz Gardawski
Adam Mrozowicki
Vera Trappmann
Katarzyna Dębska
Sara Herczyńska
Justyna Kościńska
Kamil Trepka
Maciej Gdula

GD 第8卷 / 第3期 /2018.12
http://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 主編的話

在世界各地的許多國家，民主制度和面臨了越來越多的挑戰和壓力。 新興和老牌民主國家都可以看到威權退化：由上而下的統治，民族主義抬頭，公民社會的削弱。 婦女和少數民族的權利尤遭受威脅。 在本期《全球對話》中， 當今最著名和發人深省的女權主義思想家之一 Nancy Fraser 討論建立一個更包容的女性主義運動，並回應了民主衰退的說法，以及 99% 的女性主義思想。

「被挑戰的民主」主題下的文章研究了世界各地的民主如何面臨壓力，從種族隔離後的南非局勢，到在希臘的撙節政治，埃及革命中的女性角色的刪除。 作者描述和分析了資本主義威權主義結盟的新發展，也評估了那些強化民主制度的概念和思想。

2018 年 5 月，秘魯和拉丁美洲最傑出的社會學家之一 Aníbal Quijano 在 87 歲時去世。他關於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他的「殖民權力」研究大大影響了世界各地的好幾個世代的社會學家。 其兩位同事和朋友回顧了他一生對社會學的貢獻。

「面對貧窮」主題下的論文包括了希臘撙節政治的，拉丁美洲日益增加的貧窮婦女人口。我們 邀請了來自全球的六位作者，解釋貧窮現象的區域發展以及政策制定所面臨的阻礙。

印度的著名社會學家 Sujata Patel 在她關於全球現代性的文章中討論了全球化理論的本質和內容。 她對多重現代性的概念及其批判提出了歷史的是與解讀。

波蘭思想家從一開始在把社會學發展成為一門學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個問題提供了對波蘭歷史的深刻見解。 但是，其歷史不僅讓我們聚焦了這個國家的特殊性，其蓬勃的社會學傳統在也觸及了許多當代的核心問題。本期收錄的文章向讀者介紹了當前的波蘭社會學，像是關於年輕臨時勞動力，波蘭人近期的投票行為，以及波蘭公共領域的變化及其對當今社會學的影響。

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
《全球對話》的主編

全球對話以 17 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

投稿請寄給 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LOBAL DIALOGUE

> 編輯團隊

主編 : 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助理主編 : Johanna Grubner, Christine Schickert.
副主編 : Aparna Sundar.

執行主編 :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顧問 : Michael Burawoy.

媒體顧問 : Gustavo Taniguti.

編輯顧問 :
Sari Hanafi, Geoffrey Pleyers, Filomin Gutierrez, Eloísa Martín, Sawako Shirahase, Izabela Barlinska, Tova Benski, Chih-Jou Jay Chen, Jan Fritz, Koichi Hasegawa, Hiroshi Ishida, Grace Khunou, Allison Loconto, Susan McDaniel, Elina Oinas, Laura Oso Casas, Bandana Purkayastha, Rhoda Reddock, Mounir Saidani,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on, Nazanin Shahrokni.

區域編輯
阿拉伯 :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阿根廷: Juan Ignacio Piovani, Alejandra Otamendi, Pilar Pi Puig, Martín Urtasun.

孟加拉: Habibul Haque Khondker, Hasan Mahmud, Juwel Rana, US Rokeya Akhter, Toufica Sultana, Asif Bin Ali, Khairun Nahar, Kazi Fadia Esha, Helal Uddin,
Muhaimin Chowdhury, Md. Eunus Al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dreza Galli, Lucas Amaral Oliveira, Benno Warken, Angelo Martins Junior,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法國/西班牙: Lola Busuttil.

印度: Rashmi Jain, Jyoti Sidana, Nidhi Bansal, Pragya Sharma.

印尼: 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Diana Teresa Pakasi, Nurul Aini, Geger Riyanto, Aditya Pradana Setiadi.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Sina Bastani, Sayyed Muhamad Mutallebi, Vahid Lenjanzade.

日本:Satomi Yamamoto, Sara Maehara, Masataka Eguchi, Riho Tanaka, Marie Yamamoto, Kaori Hachiya, Ayana Kaneyuki, Erika Kuga, Kaya Ozawa, Tsukasa Shibagaki, Michiaki Yuasa, Rikuho Baba.

哈薩克: Aigul Zabirov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Almagul Mussina, Aknur Imanku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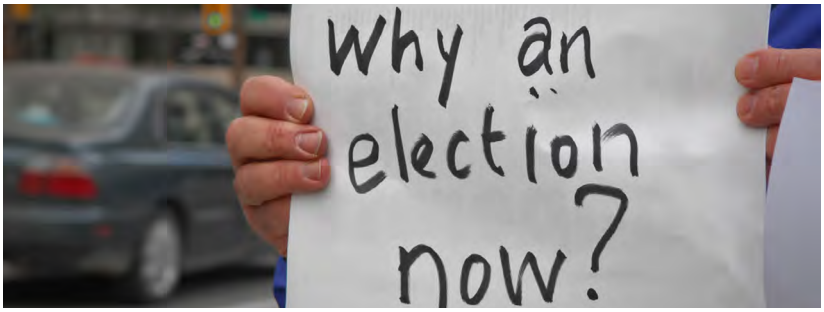
波蘭: Jakub Barszczewski, Iwona Bojadżijewa, Katarzyna Dębska, Paulina Domagalska, Krzysztof Gubański, Sara Herczyńska, Justyna Kościńska, Łucja Lange, Adam Müller, Zofia Penza-Gabler, Anna Wandzel, Jacek Zych.

羅馬尼亞: Cosima Rughiniș,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Luciana Anăstăsoaie, Adriana Lavinia Bulumac, Cristian Chira, Denisa Dan, Diana Alexandra Dumitrescu, Radu Dumitrescu, Iulian Gabor, Alecsandra Irimie-Ana, Bianca Mihăilă, Andreea Elena Moldoveanu, Rareș-Mihai Mușat, Oana-Elena Negrea, Mioara Paraschiv, Alina Cristina Păun, Codruț Pînzaru, Susana Maria Popa, Adriana Sohodoleanu, Elena Tudor.

俄國: Elena Zdravomyslova, Anastasia Daur, Valentina Isaeva.

臺灣 : 何經懋

土耳其: 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當今世界許多地方的民主制度都遭受挑戰。本期文章中有八位社會學家處理了這個問題，討論人們如何為更民主的社會而亢爭，並批判性地分析當前的民主政治。

貧窮問題和貧窮人口始終是社會學家迫切需要解釋的問題。本期文章收錄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五位社會學家討論了貧窮政策的區域比較，並分析了食安等議題的不同歷史脈絡。

介紹波蘭社會學的歷史發展以及對該國當前社會學研究的剖析。

GD

Global Dialogue由SAGE出版社提供贊助。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 2

> 談論社會學

新自由主義下的女性主義：
訪談Nancy Fraser
Christine Schickert, 德國 5

> 被挑戰的民主

民主的危機
Hauke Brunkhorst, 德國 9

威權資本主義的興起
Christian Fuchs, 英國 11

族群化的公民成為非法公民
Andrea Silva-Tapia, 德國 13

後1994南非的民主謬誤
Hlengiwe Ndlovu, 南非 15

雅典的民主
Gerassimos Kouzelis, 希臘 17

社會媒體與民主：雙面刃？
Haryati Abdul Karim, 馬來西亞 19

阿根廷的民主倒退
Esteban Torres Castaños, 阿根廷 21

埃及革命中女性角色的刪除
Amy Austin Holmes, 埃及 23

全球治理：民主秩序的概念？
Peter Wahl, 德國 25

> 紀念ANÍBAL QUIJANO, 1928-2018

傑出的知識分子
Nicolás Lynch, 秘魯 27

戰士的喜樂
Raquel Sosa Elízaga, 墨西哥 29

> 面對貧窮

後種族隔離貧窮的特徵
Joshua Budlender, 美國 30

後舒困福利國家：希臘的平窮面貌
Vassilis Arapoglou, 希臘 32

為什麼拉美的貧窮人口以女性居多？
Juliana Martínez Franzoni, 哥斯大黎加 34

「慈善經濟」：福利國家的陰影
Fabian Kessl, 德國 36

食安論述：21世紀的挑戰
Mustafa Koç, 加拿大 38

> 理論視角

全球現代性
Sujata Patel, 印度 40

> 波蘭社會學

我們(何時)重要嗎？回顧波蘭社會學
Marta Bucholc, 德國/波蘭 43

波蘭和德國的年輕臨時勞動者
Jan Czarzasty, Juliusz Gardawski, Adam Mrozowicki, 波蘭, Vera Trappmann, 英國 45

為什麼人民投給右派？
Katarzyna Dębska, Sara Herczyńska, Justyna Kościńska, Kamil Trepka, 波蘭 47

新公共領域社會學願景
Maciej Gdula, 波蘭 49

「在世界中，我們不能想像文化，種族，族群上同質的民族國家了。 聆聽那些無聲的人民是為了深化民主而必須付出的歷史代價。」

Andrea Silva-Tapia

> 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女性主義

訪談Nancy Fraser

Nancy Fraser 是當今最傑出的批判理論和女性主義思想家。她是紐約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的哲學和政治學教授。她著作等身，其中包括再分配和認同政治與哲學交流 (2003)，與 Axel Honneth 的辯論，也提出了正義和不正義的理論，認為正義可以通過兩種方式概念化：分配正義和認同正義。她認為重分配和肯認對於正義來說相當重要。她出版了大量關於女性主義的書籍和文章，既是學者又是運動者，包括 Fortunes of Feminism: From State-Managed Capitalism to Neo-liberal Crisis (2013)。本訪談是她接受了德國 University of Jena 社會學系後成長社會研究小組主任同時也是全球對話助理編輯的 Christine Schickert 的採訪。

Nancy Fraser.

CS：你的文章「Feminism, Capitalism and the Cunning of History」已經出版近十年了。 在其中，你基本上認為主流或自由女性主義已被資本主義所收編。可以闡述一下嗎？

NF：我正在一個特別實機寫這篇論文，這是在世界金融危機正在發生的時候，歐巴馬談論希望和改變，當選為總統。此時，每個人都承認我們處於一個非常決定性的時刻，並且有希望。那個時刻的讓我突然想起了歷史和整個女性主義的歷史。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直對自由主義或主流女性主義所的方向感到不滿，我之前曾說道過度關注認同和對分配的不足，但這篇文章我清楚說了危機是什麼。

我感覺資本主義社會發生了重大轉變，與女性主義的發展同步。當第二波

>>

女性主義在 20 世紀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開始時，我們真的認為我們仍然在一個安全的，社會民主的或國家管制的資本主義社會中運作。我們認為，該政權所帶來的或多或少都是安全的，我們可以從那裡走向一個更平等和民主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女性主義將成為主角。

然而，恰巧發生的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危機，以及新自由主義的興起。這是一種全新的資本主義，女性主義者和許多進步的，社會運動的人 在瞭解這一點時非慢。簡而言之，在不了解政治經濟如何變化的情況下，我們仍然繼續這種自以為重要的議程。我們看重分配，但沒有意識到重要性，或者至少很多人沒有意識到。 我們實際上為新自由主義賦予一種吸引力和合法性，允許它的解放能量，解放的吸引力作為一種合法化的媒介。

這是該辯論的點，因為我們處於危機時刻，顯然，在 2008 年至 2009 年，我認為這是可能的實機， 正如我在文章的最後所說的那樣，要跳出框框思考，通過轉變來引入一種新的女性主義，可以成為真正的反新自由主義思想。

CS：我可以想像許多被認定為女性主義者的女性認為她們為女性主義者所做的工作受到了質疑，並對你做出防禦性的回應。

NF：當我發表文章時，我期待著我會受到批判。但實際上得到的遠遠少於我的預期，至少來自些學術女性主義者圈子而言是這樣。即使人們並不完全同意我，他們也認為我信仰的某些事情把女性主義看錯了。 人們普遍認為，我們認為我們要創造的世界並不是我們實際生活的世界。很多人真的這麼想。

我人為不需要指責，而是要了解某種形式的進步的新自由主權能夠如何構建自己並贏得戰鬥。我認為我們需要了解我們可能在不知不覺中扮演的共謀者角色，以便進行修正。沒有一位白人女性主義者喜歡聽到黑人女性的聲音，而且假設要就是與白人至上主義有關，要就是對有色女性的不同情況都不敏感。但我們不得不傾聽，我們必須吸收之。的確，我認為這也是如此，人第一時間反應通常是防禦性的，但不能長久這樣下去。

CS：但我認為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並不認為自己會推進新自由主義議程，而是爭取更多的性別平等.....

NF：這裡的問題是：平等意味著什麼？平等的概念本身很有爭議性，有相互競爭的解釋。自由主義的解釋是精英解釋，女性是個體，她們應該像男性一樣，爭取機會將自己視為個體。這裡的平等意味著消除歧視的，不平等問題是歧視問題，通過消除歧視性，個體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樣傑出。

我想說的第一件事是，這是一個特定於階級的理想。 它的真正含義是，他們希望與自己階級的白人男性相等。女性主義對我而言是一種更加強大和激進的平等觀念，這種觀念實際上並不是使性別多樣化，而是廢除之。所以精英平等不被我稱之為平等。自由精英作為對平等的解釋帶有正面影響，但僅限於一個非常小的女性群體。絕大多數女性都沒有把破玻璃天花板，而被困在地下室，他們正在清理並掃除破碎的玻璃碎片。我試圖發展另外版本的女性主義。

CS：自從美國和歐洲選出右翼領導人之後，辯論圍繞在社會運動中的「認同」的過多而忽略牲經濟不平等導致右翼崛起。這場辯論對女性主義運動意味著什麼，表面上看，我們作為女性的共同身份是一個動員因素？

NF：我認為我們可以在不同的層面上解決，在概念層面，我認為身份認同運動和階級運動是分開的說法是錯的。階級的運動有兩個方面，有結構面和認同面。我試圖在分進行理論化，並認為階級鬥爭都具有認同面，即使人們沒有明確地關注這一點。我不認為女性主義有不是階級運動。女性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從屬地位與階級剝削一樣具有結構基礎的。當人們說女性主義是一種認同運

>>

動而非階級運動時，我感到很怒。我認為我們女性的訴求有根深蒂固階級的特徵。所以，所有運動都有身份認同的面向。

但是，認同政治會讓你誤入歧途。現在有一個流行概念叫做交織性。我對這概念有一些批評，但重點是這是正確的。就是說並非所有女性都在同一條船上，並非所有工人階層都在同一條船上，並非所有有色人種都在同一條船上。認同交叉的結構並不對稱， 權力也不對稱。一位女性主義說過，「我們不會去看待這些，因為我們只是談論女性」，所以最終只會代表特權階層的女性發言。這就是自由主義，精英女性主義所做的事情。女性主義必須與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種族和所有其他主要壓迫軸線連結。

CS：你和其他一些著名的女性主義思想家最近創造一個更具包容性的女性主義運動的內含，並提出了「99% 的女性主義」的想法。你能告訴我們更多嗎？

NF：這是我們從占領運動中借來的民粹主義用語。從嚴格的社會學角度來看，它並不嚴謹的，但其具有巨大的動員能量。這這不是 Christine Lagarde 或希拉蕊的女性主義。這是一種「戰鬥用語」，將自己描述為反對玻璃天花板的女性主義。這是一次修正嘗試。幾十年來，正如我在那篇文章中所說得，某種意義上而言，女性主義的主導潮流正在轉變，像 Hester Eisenstein 所說的，是一個「危險的聯絡人」。代表 1% 的新自由主義力量的對立是代表 99% 的女性主義。這是個非常簡單的修辭策略。它實際上卡住，並獲得了一些牽引，對我來說是有希望的，只要我們去感應就會發現是這樣。

99% 的女性主義真正關注的是絕大多數女性在新自由主義，金融資本主義制度下，在社會再生產和工作生活條件惡化的情況下的女性。資本主義要求每個家庭的工資比以前的資本主義要多得多，攻擊社會福利和各種社會保護製度，並將債務作為武器。女性在攻擊中處於第一線，所以 99% 女性主義者要團結，將它們與這種形式的資本主義問題理論化，像是我們以前在 SDS(民主社會學生聯盟) 中，我們試圖命名這個體系，而自由女性主義是關於社會體系的，討論體系如何使我們的生活變得不好。

CS：但是美國 53% 的白人女性在 2016 年投票支持川普，這位候選人不僅公開性別歧視，而且不關心性別平等。99% 的女性主義思想可以觸碰到這些女性嗎？

NF：不是所有人，但我認為有很大一部分可以。當然，有些人就像投票給川普的人一樣仇恨希拉蕊的共和黨人，不會投票給她，包括商界人士，那些想要自由市場的人等等。其中很多人是共和黨人，但不是全部。 一些是來自去工業化地區的工人階級女性，這些地區因美國製造業的外移而受害，其中一些是南方的女性。南部工業地帶往往沒有工會，近年來受到波及。 還有農村女性，失業的小城鎮女性，吸毒成隱的人等等。種點是這些人不會從女性主義政治或任何版本的進步新自由主義政治中受益。

關於他們投票行為的原因，我還沒有看到太多嚴謹的民族誌研究，但是我相信會有人寫。我看過的幾個採訪報到，雖然不是系統性的，但你可以了解人們的想法和感覺。 當他們聽到好萊塢錄音 (大選之前 川普吹噓很會抓女性「雞掰」的錄音)，他們說這的很糟糕，不喜歡，不尊重女性， 不希望他那樣說話，但考慮到其他一切，他仍然是投給川普。此外，我認為也有人不喜歡川普談論墨西哥人或穆斯林的方式，但即如此，這些人認為川普是會為他們帶來好生活的。當然，我並不是說所有川普的支持者都是種族主義者。有川普選民真的是種族主義者，但是那些人我碰不到，我不擔心，我擔心那些人我認為佔了很大一部分是可以通過左手碰到的。2016 年有 850 萬美國人投川普是在 2012 年投票支持歐巴馬的。

重要的是，在 11 月大選時，另一個選擇是希拉蕊，代表進步的新自由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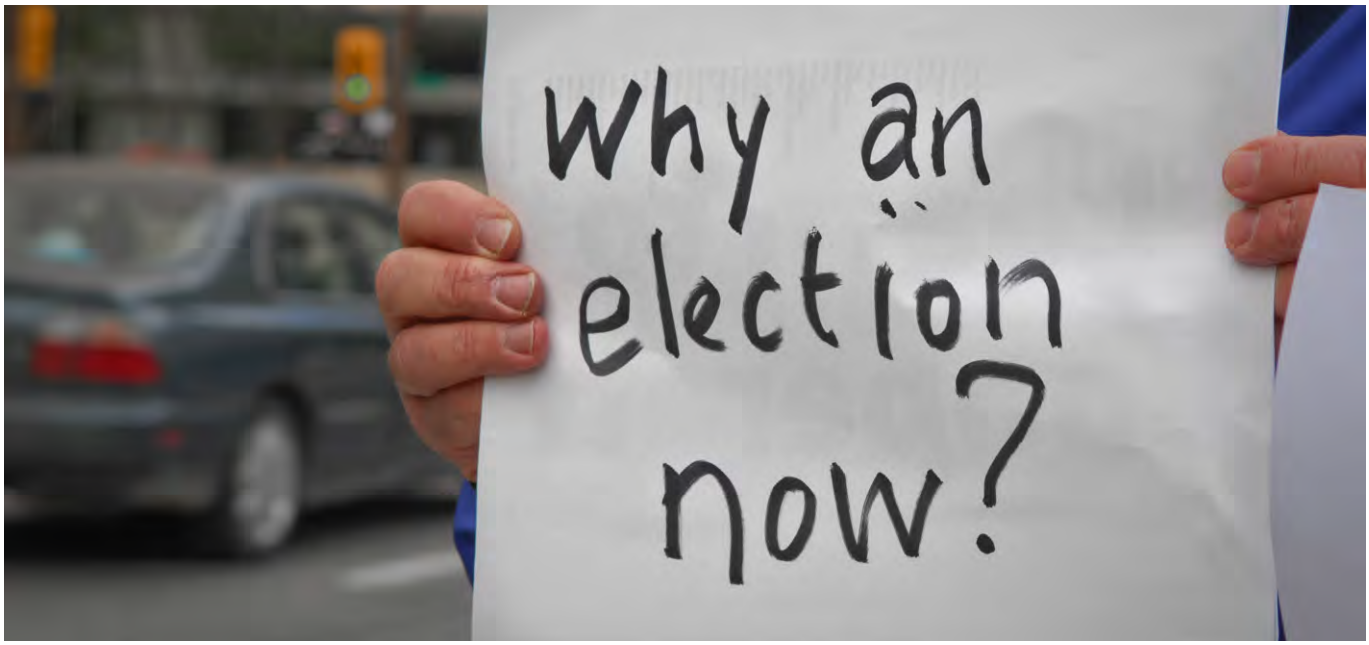
義。桑德斯代表了其他一些東西，但是初選輸了。

CS：那你怎麼看待左邊的850萬美國人？
NF： 99%的女性主義只是我的政治行動中的一部分，是為了試圖找回像桑德斯那樣的選項（我只是用他的名字作為方便符號）。要在所有進步的社會運動中它分為99%的人和1%的人 ，這當然這是粗糙的劃分，但這個想法很清楚的：團結起來。你與桑德斯的像似是你可以將許多支持工人階級，民生題結合起來，包括免費醫療保險，廢除銀行，以及大學免學費。
NF：我所說的工人階級時不只有白人，在美國的工人很多有色人種和女性， 因此，對於有色人種來說，採取這些有利於99%的民生問題，並加上司法改革的議題，是緊迫的，而生育自由對女性來說是緊迫的，其他很多被歸類成認同政治，但是不應該這樣歸類。所以我認為99%的女性主義是其他社會運動的模範。例如我們也要有有99%的環境保護主義。我們有各種運動，但是我們需要用一個共同的框架讓它們結合在一起。

來信寄給 Nancy Fraser <frasern@earthlink.net>

> 民主危機

Hauke Brunkhorst, University of Flensburg, 德國



社會科學中對民主危機的分析很普片。 Flickr/ItzaFineDay. 保留部份權利。

經過一個世紀的激烈，血腥和殘酷的階級鬥爭，全球內戰和世界革命，資本主義國家成為國際都會國家 (例如第 23 至 26 條，德國基本法)，民主和社會國家 (第 20 和 28 條，德國基本法)。在全球北方，正義是「存在概念」(黑格爾)。

生產關係部分已經被社會化，財產可被分成無數不同的形式，包括私有財和公共財。 資本家和工人在同一個海濱度假勝地度假，資本家享受海景，工人享受街景。他們不能一起游泳，一起在同一個海灘上，孩子不能到同一所學校唸書。工人駕駛貨車，老闆開轎車，可是兩者都會碰塞車，因為還沒有摩天大樓為富人蓋直升機停機坪， 也還沒有窮人的摩天大樓。

然而，全球北方的繁榮奠基在南方的痛苦上。福利國家針對的是白人，男性，異性戀。沒有存在的矛盾就沒有存在的正義 (黑格爾)。民主在是色盲和性別盲的，自 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新的社會運動興起，人權取得進步，有色人種獲得公民權利，婦女解放了，殘疾人士獲得權利，自決，環境保護意識抬頭，國際城市都會化。學生和工人於 1968 年 5 月在巴黎聯手造反時，現代資本主義 (Boltanski) 的藝術批評和社會批判合流的夢想似乎終於實現了。不可能的成為可能。 然而，隨之而來的是經濟衰退。

> 從國家鑲嵌市場到市場鑲嵌型國家

在西方國家的支持下，智利 (1973 年) 和阿根廷 (1976 年) 發生了血腥軍事政變，而英國 (1979 年) 和美國 (1981 年) 的新保守派選舉勝利，官僚社會主義的自我毀滅 (1989) 最終消除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最後障礙。在短短幾年中，國家嵌入式市場，成為市場嵌入型的國

>>

家體制。公共法的首要地位被大量(並且不斷增長的)的私人法和跨國制度取代，如以前的羅馬民法，這完全是為了符合追求帝國統治階級的利益。法律形式主義將我們所有人從非正式統治中解放出來，獲得高度動態的非正式法律，揭示了正式成文法和非正式不成文法的新「雙軌國家」(Fraenkel) 的輪廓。

典型的例子就是歐盟。希臘在 2015 年危機高峰時期被排除在外。歐盟主席的律師解釋說，歐盟沒有程序規範，因為它在法律上基本上不存在，其成員除了謀殺之外幾乎可以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情。

制市場整合阻礙了國家的經濟實力，其組織權力和警力保持不變，以有效執行「工廠維修隊」的角色，確保「整體市場秩序」的維繫，堅定地「鑲嵌」力量(哈耶克)。嵌入市場可以確保投資者自由選擇國家，但國家不能選擇投資者，因此彼此競爭，以獲得有吸引力的生產條件。 結果，階級，民族，國籍，世代之間的社會差異之大，可謂可怕。

足球比賽在很多方面都是全球社會的反映。如果英超聯賽中的職業球員的收入只是 1985 年普通球迷的兩倍，他們現在可以獲得 200 倍的獎金。隨著球員收入的增加，門票價格也隨之上漲。足球迷有的無法跟上，有的辭職離開了，看台上剩下人都是賺了錢的人。體育場外有同樣的情況：破敗不堪的社區，學校，政治冷漠，酗酒，毒品，賣淫。這些地區投票率低於 30%，而富裕地區的投票率則上升至 90% 以上，為後者的進步提供了前進的幻想。即使進度不多，但至少有錢賺。左翼政黨在不斷失去選民的情況下，在每次選舉中都進一步向右移動，正如人們所預期的那樣，市場經濟無限地競爭下去。

> 社會不平等開啟政治不平等

女性主義和多元文化主義摧毀了幾十年的統治霸權，但正在失去其「公平價值」(Rawls)。失業人士，猶太人，女同性戀和以前被定罪的黑人女性再也不能離開「血緣連帶」(馬克思)，那裡有反猶太主義，反同性戀和厭惡女性的偏見，並且面臨警察和男性的歧視和暴力。

如果競選活動只提供技術替代方案，特點就是對世界市場進行微觀經濟戰略的調整，而不是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選擇，於是民主已死。

購物中心的「閃閃發光的苦難」(康德)在利比亞沙漠，在海上，和在我們南部邊境的難營中露出了可怕的但不閃閃發光的面孔。在希臘 Lesbos 島上的 Moria 難民營現在已經轉變為驅逐出境中心，歐盟正在徹底轉變。「自由，安全和正義的領域」(「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4 條，以下稱 TFEU)「尊重基本權利」(TFEU 第 67 條)，保障國際「庇護權」(文章第 4 條) 18，「歐盟基本權利憲章」和「遵守不驅逐的原則」(TFEU 第 78 條)，其中「種族主義和仇外心態」被預防和打擊 (TFEU 第 67 條)，被制定成具體的法律。不衛生，沒有足夠醫療資源，以及過度擁擠的 Moria 難民營可以看到，第一，磚牆邊界包括拘留營，被拒絕住房的尋求庇護者，新來的遭准驅逐出境的非法移民。第二，邊界由鐵絲網，瞭望塔和武裝警衛組成，圍繞著難民營，中心是拘留所。第三，大海上的島上沒有人被允許離開，只單單憑藉著我們對海洋市場的保護，邊界成為自然法的一個要素。無論誰到達都被拘留，就好像旅行是犯罪一樣。如 Carolin Wiedemann 所言：「像 Moria 這樣的地方設計瀰漫歐盟。該被稱為「受監控中心」[德語：，Kontrollierte Zentren’]。我想沒有人會想去猜這個縮寫是什麼意思。」■

來信寄給 Hauke Brunkhorst
<brunkhorst@uni-flensburg.de>

> 威權資本主義的興起

Christian Fuchs,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英國

近年來，極右政治擴大並鞏固了其權力。我們在美國有川普（共和黨），在匈牙利有 Viktor Orbán (Fidesz)，奧地利有 Heinz Christian Strache（自由黨），在荷蘭有 Geert Wilders（自由黨），在印度有 Narendra Modi (Bharatiya Janata 黨)，在土耳其有 Recep Tayyip Erdo an (AKP)，波蘭有 Jaros aw Kaczy ski（法律和正義），法國的 Marine Le Pen（國民陣線），意大利有 Lega Nord，俄國有普丁（全俄人民陣線）等。如何理解這些現象？社會學如何解釋？

一個角度是應該從民粹主義的概念來關照。Jan-Werner Müller (2017) 最近在他的「什麼是民粹主義」一書中將民粹主義定義為「政治的一種特殊的道德想像，一種感知政治的方式，這種方式將道德純潔和認同的人與那些被視為腐敗背德精英聯繫起來。[...] 民粹主義是反民主的：民粹主義者聲稱他們，只有他們代表人民。「他還指出，民粹主義是」一種排他性的身份認同，「構成」對民主的危險，「目的是」壓迫公民社會。」

光譜的左邊有 Syriza，Evo Morales，Podemos 或 Bernie Sanders（桑德斯），右邊有川普，Geert Wilders 或 Marine Le Pen。像極權主義理論，激進的右派與左派相比較起來，右派的危險是很明顯的。對 Müller 來說，川普和桑德斯都是民粹主義者。桑德斯當然是一位非典型政治人物，但與川普相反的是，桑德斯是民主派。

我在 2018 年的著作「Digital Demagogue: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Trump and Twitter」結合了批判性的政治經濟學，意識形態批判，批判心理學。右派威權主義 (RWA) 包含了四個要素（見圖 1）：自上而下領導的必要性；民族主義；區辨敵我；激進的父權（法律和秩序；戰爭和軍隊；征服的敵人；保守的性別關係）。RWA 的意識形態將注意力從階級結構和資本主義轉移到社會問題。難民，移民，穆斯林等被建構為代罪羔羊，要為失業，工資低，經濟停滯，公共服務衰退，住房危機和犯罪等問題所負責。川普指責墨西哥和中國導致去工業化和經濟衰退，但沒有提到美國資本如何外包工作的作法，包括中國血汗工廠和墨西哥邊境加工廠，都是在剝削勞工階級。

RWA 既不是一種想法，也不是結構，也不是社會形式。RWA 是一個可以在不同層次發生的過程：個人（威權人格結構，意識，個人政治行為），政治團體，意識形態，制度，社會整體。右派極端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是 RWA 的加強版，其積極追求身體暴力和恐怖作為政治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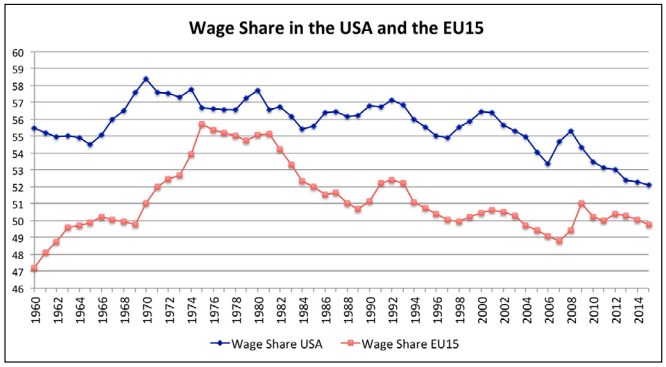
文化主義者對 RWA 的興起這樣解釋，說「後物質主義」社會的興起造成了世代之間的鴻溝，老一代對過去的的保守價值失去有所呻吟。但是，後物質主義假設無法解釋為什麼在 2017 年的奧地利聯邦選舉中，極右翼是 16-29 歲年齡的人最受歡迎的 (30%)，但對於 60 歲以上的人是排名第三而已。

圖1：右翼威權主義模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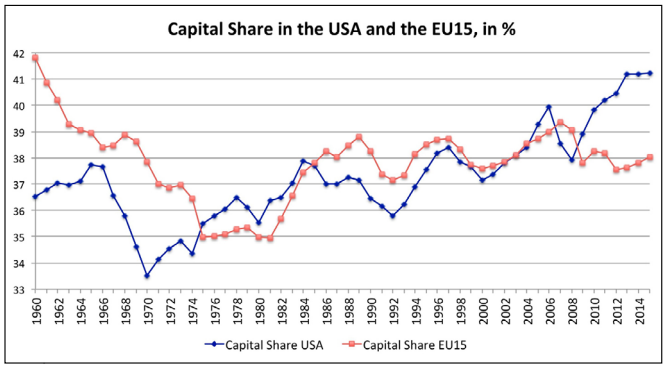
另一種解釋是政治經濟學取徑。 批判性政治理論家 Franz L. Neumann 在 1957 年的論文「Anxiety and Politics」中的取徑很有用。根據這種解釋，右翼威權主義的興起與勞動的異化有關 (見圖 2 和圖 3)。其破壞性的競爭，社會異化，對社會衰退的恐懼，政治制度，政治人物和政黨的異化。極右派的制度化焦慮度發了社會恐懼，尋找代罪羔羊。

圖2：隨著時間的過去，美國和歐盟的工資在GDP中的比例



資料來源: AMECO.

圖3：隨著時間的過去，美國和歐盟的資本佔GDP中的比例



資料來源AMECO.

威權資本主義是新自由主義資和本主義相互辯證的結果。市場自由與社會自由之間的矛盾導致 2008 年的經濟危機和不平等加劇，成為一新的政治型態。社會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化和新自由主義，左派的弱點，以及低估階級政治和階級分析重要性的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加劇了極右翼和專制資本主義的興起。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導致了異化。Harvey，Hart，Negri 等人，及我自己在其他地方所論證的那樣，新自由義帶來了幾乎所有事物的商品化，因此我們通過剝奪和資本下真正的社會包容經歷了持續的原始積累。David Harvey 說：「異型導致了佔領運動以及右翼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以及種族主義運動。川普是不折不扣的異化總統。」

來信寄給 <christian.fuchs@triple-c.at>

> 族群化的公民身份作為非法公民

Andrea Silva-Tapia, 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和Justus Liebig University Giessen, 德國

> 殖民地的公民身份和民族國家建構

公民身份的概念很模糊，其意義爭論不休。有人認為公民身份是指由國籍合法身份，有人則認為是一種社會身份。放在一起看， 如 T.H. Marshall，Margaret Somers，T.K。 Oommen，Engin F. Isin 和 Patricia K. Wood 等人的定義可以被描述為政治和地理空間中的成員類別。 因此，公民身份的概念是民族國家的法律和象徵類別。說起來簡單，但是若考慮公民身份概念的歷史脈絡，那就複雜得多。

現代形式的公民身份與民族國家的概念是一起演變的。公民身份是一個同時與現代性，民族國家打造，認同歸屬感緊密相連的概念。我們能夠追溯到十八世紀晚期的民族國家興起，法國和美國的革命以及殖民地國家的獨立，這種觀念遵循同樣的民族國家建設模式。現代民族國家被定義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有成文憲法，並以平等公民的名義統治。 因此，合法性原則從君主制 (或君權神授) 變為人民主權國家。然而，這些公民身份和民族國家的概念是以建立民族國家 (歐洲中心主義) 為基礎。

非法公民身份是另一種命名殖民公民身份的方式，這種公民身份被納入我們現在的父權制，歐洲中心和以基督教為中心的世界體系中。這種殖民世界體系通過全球種族或民族階層來運行，這階層決定了某些群體可以享有聲望，其他群體則無。Anja Weiss 認為，「當一個長期穩定的類別決定了社會分類，實踐，制度時，不論是否屬於該類別，這種標記都指向生物或其他種類的差異。」這種種族化或種族化的公民身份不僅體現在世界各地的土著和少數民族群體中，而且體現在遭受種族化 / 種族化進程的移民身上，如德國土耳其人，或美國的拉丁美洲人。這種種族化過程意味著一個群體由於其種族或文化特徵而被歧視成一個同質群體。

在這個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體系中的民族國家觀念中，民族是現代國家建立的主體，也是其合法性的基礎。民族與現代國家之間的關很明顯，不會有什麼問題。我們經常互換使用「民族」，「國家」這兩個概念。有時我們甚至將公民身份視為所有人的同義詞。

> 合法和非法的公民

將國家納入同質文化群體的人被視為合法公民，而族群畫得公民則被視為非法公民。雖然後者被視為公民，但不是合法或「真的」公民。這種與種族化公民身份是一種特殊的不平等，影響人們的尊嚴和機會平等，產生歧視和羞辱。這種不平等始於民族國家誕生時的公民身份不平等，遵循之前 (民族國家或殖民時代之前) 的分類結構。民族國家打造或獨立運動的領導人推動同質的民族認同，拋棄了個殊性，就像 Mapuches(智利的土著人) 或印度的東北人 (代表印度的不同種族群體) 一樣。今日人們也用同樣的方式去對待移民 (如德國的土耳其移民)。智利的 Mapuches 和印度的

>>

「種族化的公民或是非法公民都被看成一個群體的一部分而以，從未有主體性。」

東北人生活在工業發達的地區，就業和教育機會少。此兩個群體都經歷了與國家和警察的糾紛衝突)，他們的身份面被壓迫。就東北人而言，他們還面臨來自其他人的暴力和騷擾，這特別發生在他們離開東北並遷移到德里，孟買等城市之後。

合法和非婚生公民是兩種類型的公民，儘管兩者都有法律上的承認。 然而，前者被認可，而後者則被認為是次等的。非法公民「缺乏」某些要素，他們的文化和行為被認為是不完整的，這也引發了歧視和羞辱。

> 為民主帶來的後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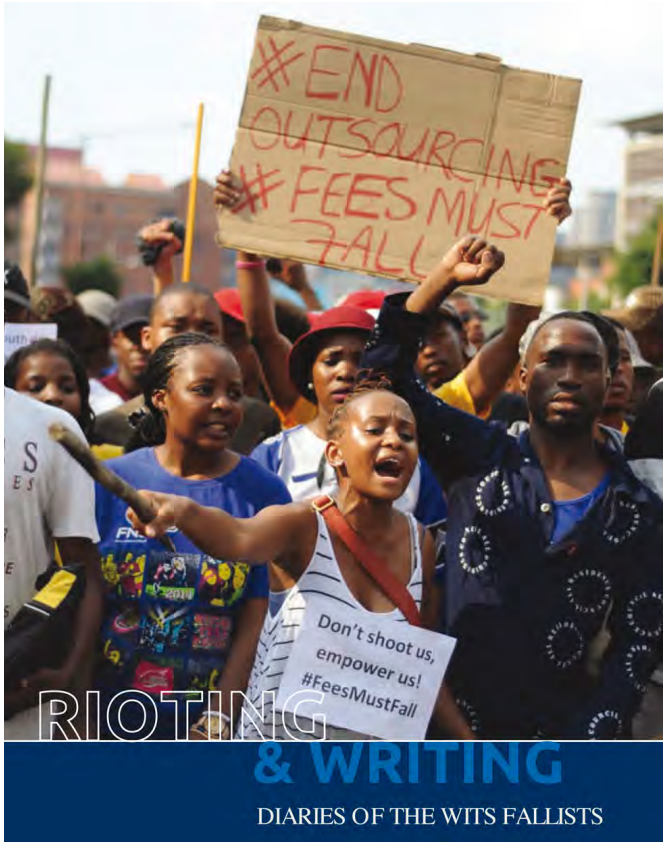
公民身份指向個人，但此概念當被種族化或種族化時，主體性就會被剝奪。種族化的公民或是非法公民都被看成一個群體的一部分而以:「移民」,「阿拉伯人」,「穆斯林」，「原住民」，「東北印第安人」，從未有主體性。主體性是留給白人的。因此,歐洲白人的失敗會被歸因於個人錯誤，因為他們是公民，有特權。這就是「白人特權」。另一方面，被殖民者的失敗，非法公民的錯誤，都被歸因於他們的文化，民族，種族因素，不歸因於個人因素。非法公民總是屬於某個種族，不像白人是個人。白人特權是一種無形的至高無上特權，永遠不會被連結到種族。種族對白人來說不存在，這個事實帶來了自由。成功和失敗都被視為個人因素，和種族無關。

若我們不認真對待其要求，不承認某些群體的經歷，那最終會可能產生衝突和暴力，所以我們不能幻想一個文化，種族或族裔都同質的民族國家了。要傾聽那些沒有發聲權力的人，這是根植於歷史的民主化任務。■

來信寄給 Andrea Silva-Tapia
<andrea.silva-tapia@sowi.uni-giessen.de>

> 南非1994年後的民主悖論

Hlengiwe Ndlovu,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南非



受到了#FeesMustFall運動啟發和來自於運動分子的資料而成。著作權: SWOP.

南非近年自 1976 年 Soweto 學生抗爭以來，受到前所未有的學生運動的影響。#FeesMustFall 運動於 2015 年出現，持續到 2016 年。這些需求圍繞著免費教育以及高等教育機轉型和去殖民化。運動跨越了所有公立大學，其特點是學生和外包大學工人之間的聯盟。 這些鬥爭的核心是直接對抗民主的失敗，以及 1994 年以後的「彩虹國」的失敗。

雖然民主的概念有好幾種，包括民選政府，自由，和公正公開的選舉，以及行使個人權利，但對於許多南非人來說，民主的含義奠基在歷史上對大多數本地人的排除。除了幾個世紀的奴隸制和殖民主義之外，還有 46 年的種族隔離，這制度故意將黑人與社會、文化、空間、經濟隔離開來。南非黑人要的是民主的具體內含。由抗爭的代表人物之一圖圖主教創造的「彩虹國家」的想法表明，隨著種族隔離的消失，南非將成為一個平等擁有社會文化和經濟資源機會的國家。

#FeesMustFall 運動是圍繞著認識到民主是一場鬧劇，而彩虹國家是迷思的抗爭。雖然大多數歷史悠久的白人機構，像是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Wits) 和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UCT) 等，都以增加招收黑人學生數量而自豪，但這遠非事實。這兩所大學是該國最貴的大學之二，具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和認知暴力。此外，雖然黑人學生人數有所增加，但高等教育機構繼續系統地將學生從社會，地理，文化和經濟方面排除。

南非預計 1994 年之後那些被排除的群體將從民主制度中受惠。非洲民族會議 (ANC) 的口號是「讓所有人友好生活。」人們期望他們的生活有所改善，包括獲得「自由憲章」提出的免費教育，不差的房子，水，電，就業機會，衛生，正如重建發展計劃 (RDP) 政策文件中所描述的那些。1994 年之後黑人地區受到抗議浪潮影響，像是 2012 年 Marikana 大屠殺，勞工部門內的暴力事件，以及 #FeesMustFall 抗議等，都表明南非國家未能提供預期的民主化果實。

南非的大學離不開更廣泛的社會秩序。若要是圖解決 1994 年後的民主危機，重要的是重新審視南非民主的談判轉型，就像非洲其他透過談判民主化的獨立國家。談判只是意味著各

>>

方的戰略性重新定位，偽裝成為實現「和平轉型」。這導致黑人人只獲得行使其投票權和組織權的政治權力 ，這一權利繼續受到 1994 年後的國家暴力影響。另一方面，土地，銀行，礦產等經濟實力和戰略資源仍然掌握在以前的掌權者手中，這使白人至上主義制度的統治地位永久化。將近 80% 的黑人被排除在經濟之外。因此，在沒有面對結構性經濟不平等的情況下，談論 1994 年後的南非民主是緣木求魚。

#FeesMustFall 運動面對黑人排除問題，並要求平等，免費教育，轉型，去殖民化。有趣的是，歷史上黑人大學，比如 Fort Hare University (其中許多非洲鬥士都受過此教育) 等，自有歷史記憶以來就一直處於這場鬥爭之中。然而，另一個問題是：南非白人至上主義媒體對歷史上白人大學的浪漫化，將這場抗爭提升到國際層次，被描繪為在 Wits 大學開始的運動。最重要的是，＃ FeesMustFall 是在 UCT 的 #RhodesMustFall 運動已經提出了課程轉型和去殖民化之後出現的。與去殖民化項目密不可分，而且這些鬥爭成為批判全球大學商業化和市場化項的一部分，犧牲了本體論和認識論的討論。

雖然歷史上白人機構聲稱已經改變了學生人口，但結構性系統排斥繼續沿著種族界限分配不平等。 過高的費用意味著那些有能力支付的人 (主要是白人優秀學生和一些中產階級黑人) 將有機會接觸，可是大多數黑人學生被系統地排除在外，這讓彩虹國家的觀念幻滅。此外，國際和南非的學術人士仍然是白人為主，而學術課程仍然以歐洲為中心。這造成了文化衝突。大多數學術人員未能採用非洲中心的本體論和認識論知識生產方法繼續對來自貧窮鄉鎮的大多數黑人學生構成巨大挑戰。

#FeesMustFall 運動對抗民主制度的失敗，倡議實現具體的民主和實現彩虹國家的夢想。儘管該運動對大學和國家構成了巨大的挑戰，但它也面臨著自己的挑戰。在其最初的階段，運動的特點是政治聯繫，種族和階級議題的結合。然而一開始就有意識形態問題，性別問題，缺乏內部民主的問題。雖然這項運動是由 womxn 開始的，但是男同志有意接管了運動，並破壞了 womxn 所建立的基礎。然而，＃ FeesMustFall 中的 womxn 被認為不會複製他們正在反對的權制。於是運動分裂，因為許多人指責不同的分裂原因。此外，國家和大學鎮壓非常暴力。警察在校園內，過度使用武力。學生被瞄準，逮捕，排除在大學之外。但是鑑於非民主國家的鎮壓性質，該運動不得不撤退並探索推進鬥爭的其他方法。

#FeesMustFall 運動目前處於不確定狀態。一些學生運動分子仍然在監獄和法庭中奮鬥著。儘管南非正在推動窮人免費教育，但仍要繼續爭取自由和去殖民化教育。民主仍然是 20 世紀 90 年代在南非街頭的影響。最終釋放了已故的抗爭英雄曼德拉和和其他政治犯。對於大多數南非人來說，民主仍然是一種空洞的概念，而彩虹國家則是迷思。對於 #FeesMustFall 運動者來說，抗爭仍在繼續，對於 womxn 和其他邊緣的機構來說，民主在未來幾個世紀仍然有得抗爭。■

來信寄給 Hlengiwe Ndlovu <hlengiepn@gmail.com>

> 民主在雅典

Gerassimos Kouzelis, University of Athens, 希臘

希臘議會前抗議撙節政策。Flickr/konterz. 保留權利。

今天若要談直接民主可能聽起來很烏托邦，主要是它實際限制很大。像是最近的研究指出，在議會之外進行實質民主的想法是激進的烏托邦想像。在體制外或是 非民主的國際組織 中，「人民」如何行使權力？根據「諒解備忘錄」指出的，希臘的條件不利於民主運作。 議會和民代 無法自主，其決定都是事先就被決定的。

國家主權被妥協掉，議會自主決定的權利於是形成一種產品 (或許對有些人來說是合理

的)，這種危機被認為屬於財政方面的：債務。這是讓國家主權妥協的原因，只不過於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的緣故，讓財政被放大。在沒有對手的情況下，毀滅性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相當普遍，經濟部門之間關係的政治和社會激進的重構， 特別是資本主義整合和經濟權力集團的結盟，讓力量的相關性允許，培育，剝削了經濟危機。

儘管「新自由主義統治」這個論述簡單明瞭，但是也說明民主的倒退如何可能 (「新自由主義」)，這種論述能夠抓到，合法化，拓展此一論述。從希臘危機的角度來看，對民主的深度解構是新自由主義的真理。 此論述的流行代表了自身條件及其後果，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動態，以及短期波動相關的一系列發展都和社會威權主義習習相關。

政治變遷以前我列出了 2010 - 2015 年期間幾個核心焦點：

• 從根本上著手，增強經濟實力，從社會出法，加速生產，其特徵是滲透「精英」並將經濟利益與政治利益掛勾。

• 媒體和文化實踐的完全商業化 (特別是以黨派為由組織的壟斷大眾媒體和新聞媒體)。

• 代議士的衰落和商業營銷式復甦 (政黨「超越」政治，是商業產品，以電視「明星」為效法)。

• 強加商品流通 (「市場帶領」) 作為其主要原則。

• 「民主管理」的強加，並在不斷擴大行

>>

政部門和部分司法部門的過程中實施，犧牲了立法機關 (通過部長決定，未經議會批准和司法干預，具有政治性質和任意的。)

• 國家主權在國家社會形態和國際結構中的不穩定 (通過「三馬車條件」的日常保護。

• 建構一種小島無法進行民主制度，議會功能不彰的論述，財政和貨幣政策領域特別如此，但也是布魯塞爾決定的大部分 (確實是「異常狀態」) 。

當 2015 年的政治變革時，這些面向也發生了變化。所以加強民主進程的目標，也就是 激進左翼聯盟設法扭轉了最新政局發展。可是議會控制權沒有得到，大多數決策仍由外部決定或與對 (所謂的)「制度」的承諾。

新的政治條件限制了與納粹團體公開合作的機會，安全措施的實施，以及監視和威權鎮壓的行動，這些限制使社會開啟民主機制。日常社會和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再次變得「正常」。

可是新自由主義論述仍有兩個領域決定條件， 第一個是將現實看成財政報表，作為會計項目，「人民」既不能了解也不能決定，因此基本上是反民主的。 第二個領域是公共領域的解構，這樣一來，公眾輿論無法形成。儘管政治發生了變化，但被壟斷的媒體的霸權論述仍然是壟斷「現實建構」的主要因素，而實質辯論和爭論卻不常見。

因為無法改變這兩個領域的力量，這讓我認清了，民主進程的解構與新自由主義的危機沒有關聯，因為社會組織的各個方面必須被認為是「系統性的」，並且被當成當代民主危機的關鍵。

另一方面，經濟危機帶來的民主到退證明了權利「必要」被限制的論述發揮了作用，情況不一樣了。這不僅涉及社會權利，也因為難民危機和對恐怖主義情緒的操縱 (選舉和公民投票) 導致了公民政治權利的妥協。前五年，政府開始徹底遏制社會權利 (工作，社會福利，健康等)，否認政治要求 (控制和公眾輿論)，宣傳民主是「奢侈品」的想法。 新政府優先考慮經濟，遺忘民主原則，用藉口搪塞一切。

如果政治地景沒有改變，危機繼續存在，無論是在意識形態上還是在實質上所有公民的生活組和觀點以及思維方式都受到威脅。家庭和社區的未來也是如此。這很重要，因為缺乏觀點是極權主義和反民主的溫床。

新納粹勢力的力量已經形成威脅，危險地蔓延開來，並且與政治的再現相關，此一再現形式代表了希臘的一種新現象，其形式是典型的經濟和「日常犯罪」，支持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的論述，甚至是獲利和權力的主流新自由主義論述 (「強烈的人格」以及「有效的決策」，無視制度規則和「官僚」限制) 發揮相當影響力。 這不僅經常漂浮在一個空洞的論述中，也是一個容忍打群架「政治」的制度。我們要知道，民主正在倒退。■

來信寄給 Gerassimos Kouzelis <gkouzelis@pspa.uoa.gr>

> 社會媒體與民主：雙面刃？

Haryati Abdul Karim, Universiti Malaysia Sabah (UMS), 馬來西亞

手機和社群媒體成為政治參與的工具。Flickr/Sakuto. 保留部份權利。

社群媒體對社會最深刻的影響之是它培力普通公民決，社交生活的特點是網際網路的行動主義，透過智慧手機可以輕鬆地讓各行各業的人參與其中。這確實為公民在對匿名的前提下可以公平和自由地參與有政治討論。這在言論自由才剛興起的國家來說，特別具有重要性。

馬來西亞也不例外。馬來西亞人著迷地利用社群媒體在各種問題上表達看法，這是前所未有的。他們習慣於討論，分享，或上傳他們的社群媒體帳戶視頻，並開始在朋友之間進行交流。 Facebook，Instagram 和 YouTube 等社群媒體在馬來西亞人中非常受歡迎。Facebook 是第一受歡迎的，大約 81% 的馬來西亞人使用 Facebook，其中近 90% 是通過智慧型手機。

在社群媒體實際上「解放」馬來西亞人，人們可以公開表達他們對政府的觀點，就算是敏感的問題 (如宗教和種族) 也常見人們討論，

>>

這這形成了健康和充滿活力的公共領域氛圍，讓人們參與政治。 除了政治，社群媒體還使馬來西亞人能夠表達和創造出多元的全球在地化認同。

媒體被政府壟斷的國家，因為透過收購和通過立法，替代溝通管道仍很有限。 因此，人們被使用地下媒體。在公眾輿論方面，與傳統新聞媒體，社群媒體更有效。一個例子是阿拉伯之春，因為公共溝通短到受到嚴重限制，於是公眾對政府和主流媒體失去了信任。 社群媒體成為人民的唯一新聞消息來源，危機表達意見的空間。

在馬來西亞，社群媒體帶來了 2008 年大選期間的政治浪潮，全國聯盟政府的被瓦解。BN 的政治對手，當時被稱為希望聯盟 (PH)，只有在地下媒體出現，因為它被排除在主流媒體之外。社群媒體成為 PH 的強大宣傳工具，網路便利地傳播訊息。人們加他們的 Facebook 成為粉絲，凸顯其政見像是商品和服務稅 (GST)，高生活成本和貪腐等政府問題。這都引起了網路的論，並創造了一個公共領域。支持的部落課使用他們的部落格去塑造對有利的公眾輿論。在最近結束的第十四屆大選中，WhatsApp 開始被用作 Twitter 和 Facebook 之外的競選工具。與 Facebook 不同的是，WhatsApp 可以親自聯絡到人。在 WhatsApp 聊天組中就形成了公共領域，他們討論 PH 的競選新聞。這或許許這是精心設計過的策略，因為 PH 專注於具體問題，並一直重複，最後贏了。BN 社群媒體經營很慢，因其控制主流媒體。 PH 的贏得了 222 個國會中的 113 個議席席位，而執政黨在 2018 年只獲得了 79 個席位。

若審視社群媒體，新聞自由，民主之間的關係，社群媒體是一把雙面刃。網路為言論自由和賦權打開大門，也為假新聞和病毒提供了散播渠道。假新聞已成為馬來西亞的嚴重問題。最近一次的大選裡面，選民們被假新聞淹沒，社群媒體沒有什麼真實新聞。 一旦假新聞當道，那就是否定了公民了解真相的權利。 過度依賴社群媒體作為唯一的信息來源是假新聞散播的推手，因為人們不去查證新聞來源。馬來西亞政府試圖在 2018 年通過「反假新聞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未能明確界定什麼新聞是「假」。所以假假真真，真真假假，法案也沒有真的被落實，因為新政府已經打算廢止這樣法案。所以到底是真是假？沒人知道，人們以假亂真，所以難辨真假。

社群媒體還有一個潛在威脅，那就是中心地位的政治狂熱主義者會讓其他邊緣位置的人遭到網路霸凌，這是違背民主精神的，其他人則因為這樣的兩極化而受傷。即使有人提出合理的看法，政治魔人會群起攻擊意見不同的人，這是在剝奪其他人表達意見的權利和自由。這是不文明和不理性的。

若要讓社群媒體成為促進民主化的工具，文明化和媒體素養必須先到位。我們必須讓公民理解理性溝通的意義，唯有這麼做民主才會深化。■

來信寄給 Haryati Abdul Karim
<haryati@ums.edu.my>

> 阿根廷的民主倒退

Esteban Torres Castaños, Cordoba國立大學, 國立科技委員會 (CONICET), 阿根廷

阿根廷的經濟危機帶來了民主倒退嚕。Flickr/Alex Proimos保留權利。

阿根廷正歷經了明顯的民主撤退。如果看著軍事獨裁統治的崩潰和拉丁美洲左翼進步力量的消長，去分析拉美的民主，那其實很難取解釋這樣的撤退。當代民主化被一種社會過程，在其中公共領域不斷擴大。這個過程有三個關鍵因素：技術 -- 政治面向，技術 -- 經濟面向，技術 -- 傳播面向。每一個都有複雜度。在這文章中，我想簡單描述一下 2018 年阿根廷民主結構性退卻的關鍵事件。這些事件與政治壓迫的面向以及技術經濟的面向有關：國家定義其宏觀經濟政策的自主性程度。

政治壓迫方面，相互加強的兩個主要事件是：1) 國家行政權通過法律建立軍事部隊，和 2) 政府在領土上建立美國軍事基地。

第一次事件是這樣：行政權機關通過第 683/2018 號法令，授權武裝部隊能夠執行國土安全任務。這樣一來，國土安全與國防之間的已經沒有差別，這加強了政府將自 2015 年 12 月 Cambiemos (執政聯盟) 勝利以來在國內與日俱增的社會抗議活動定為犯罪活動。此法一通過，Mauricio Macri 政府試圖將軍隊置於「反毒品販運和反恐計劃」之下，使其與美國的外交政策完全同步。隨著這項新法令的頒布，和廢除了第 1691/2006 號法令，由國防法 (1998 年)，國土安全法 (1992 年) 和國家情報法 (2001 年) 組成的法律框架於是脫勾。要知道，這些是三十年民主化的結果，是建立在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共識之上的。

第二次事件是政府正在推動在阿根廷境內建立美國軍事基地，技術掌握在美國南方司令部手中。目前為止確定了三個地點：三方邊境 (阿根廷，巴西，巴拉圭)，Tierra del Fuego

>>

(Ushuaia)，和 Neuquén 省。 這兩件事比次增強。美軍今年抵達阿根廷，與部隊進行聯合演習。正如兩國政府宣稱的，演習的目的是提供「打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販運」。外國軍隊要來阿跟停需要議會的授權，但美國軍隊來煤經過國會授權。

此外，我們要注意第二系列事件，這些事件在非常短的時間內讓政府完全喪失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自主性。Macri 政府一直有外部負債的政策。兩個關鍵指標是外債相對於阿根廷國民生產總值，以及與債權人作出的承諾。前者可以看到 Cambiemos 在新的金融體系內引發了史無前例的外債成長。Kirchner 政府 (2003-2015) 讓國家經濟政策在通過在與債權人的談判中去採取措施以便減少外債。改談判的成功讓經濟起飛。在很大程度上也允許放棄 1976 - 2001 年的金融體系。從 2015 年 12 月起 Macri 政府將強制性的外債看成整頓新財務系統的關鍵方式。自 2011 年以來，外部公共債務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一直在增長，當時是自 1983 年民主化以來的最低水平，是 14.2%。於是債務開始快速成長，在 Macri 執政時快速上升，直到 2018 年 6 月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 65.5%。所以阿根廷的債務係數上升速度可謂創下歷史新紀錄。本土和外幣的債務總發行量已達到近 1330 億美元，這使該國成為 2016 - 18 年期間世界新興經濟體中最大的主權債務發行人。

與債權人的關係方面，新債務週期中的主要事件是在與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達成債務合約 14 年後，阿根廷決定重新訂定合約內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角色是在備用貸款的要求中發揮作用的。阿根廷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署的前備用貸款相比，這筆巨額貸款 (500 億美元) 的新的地方式不僅要考慮稅收和貨幣目標，還要監督通貨膨脹。這樣一來，Macri 總統實際上將國民經濟的自主管理權讓渡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是變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新自由主義的信徒。

軍事美國化和高負債正在侵蝕國家主權，並在國內造成大規模抵抗和示威。反對派力量涉及各方的社會運動組織，這些行動抗議民主的倒退。雖然民主化支持者與新的全球化借貸制度的支持者之間，權力關係顯然後者趨於劣勢，但中期的國家政治前途很難說。要記住，僅僅描述目前的民主到對並不足夠，重點是從民主的複雜度中找出新的社會抗爭和創造歷史的革命理論。如此一來，我們重新可以看到新的左翼進步政治綱領，帶領我們邁向拯救民主成果的進步道路上。■

來信寄給 Esteban Torres Castaños
<esteban.tc@conicet.gov.ar>

> 埃及革命中女性地會的抹去

Amy Austin Holmes, The American University於開羅，埃及，Harvard Univeristy訪問學者

Flickr/lokha. 保留權利

阿拉伯之春引發多數學者對革命研究的新興趣，他們被解放廣場上的大規模抗議活動所吸引。儘管文獻已經滿山滿海，但女性往往在研究中缺席。H.A. Hellyer 的書《A Revolution Undone 》中以埃及革命中 27 位核心人物的詞彙表中，只提到一名女性，另外 26 名都是男性。Philip Marfleet 的《Egypt: Contested Revolution》封面上有一位女性，但內容並沒有多少女性的身影。其他著作論及女性時主要是聚焦在騷擾或暴力的受害者的角色，但鮮少討論女性作為歷史的推動者。要找島關於阿拉伯之春研究的女性身影，那我們必須在別研究中進行搜索。我自 2008 年以來一直住在埃及的開羅，幾乎親眼目睹每次抗議，每次靜坐，每個事件。但是，婦女正在從埃及革命的歷史中被抹去。「阿拉伯之春」的歷史很可能被建構成完全沒有女性，我們要還原歷史真相。

女性不只是倡導女性的權利而已。從 Mubarak 獨裁統治到多年的動盪時期，女性經常站在埃及革命活動的前線。早在 2005 年，為了在埃及的專制政府中導入課責制，三名女性成立了一個監督總統和議會選舉的小組。其稱自己為 Shayfeencom，意思是「我們正在監督你。」其中一位創始人 Bouthaina Kamel 後來成為現代埃及歷史上第一位競選總統的女性。在革命之前，Nadeem 是一個埃及唯一致力於治療酷刑受虐者的組織，其由一位女性 Aida Seif El-Dawla 博士所創立。在 2011 年 1 月 25 日之前的一周製作了病毒節目，讓數百萬人走上街頭抗議的就是 4 月 6 日青年運動的核心人物 Asmaa Mahfouz。

在 Mubarak 被驅逐之後，埃及被軍方最高委員會所領導的軍政府統治了一年半。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論述的，革命最激進的要求之一就是結束軍事統治，不是改革，不是漸進式革命，不是撤除獨裁者，而是要求從根本上改變國家結構：自 1952 年軍政府成立以來，要做的事情是在軍政府內設立文官制度，但是埃及軍方基於男性徵兵為主而治理，所以女性被排除在該政治過程之外。反軍事組織中的許多主要抗爭者都是女性，也就可以理解。廢除軍政府團體要求停止將平民納入軍事法庭。該團

>>

Bouthaina Kamel (受拍者)是第一位角逐埃及總統寶座的女性候選人。著作財產權: Amy Austin Holmes.

體的一些主要人物有 Shahira Abou Leil 和 Mona Seif。另一個團體通過公共領域的放映影片去揭露軍方犯下的許多侵犯人權行為。這個團體叫做 Askar Kazeboon，意思是軍方式大騙子，由科普特基督徒 Sally Toma 創立。

女性通常是透過談論對性別暴力去來破壞社會禁忌。Samira Ibrahim 針對被軍方拘留婦女進行童貞測試進行大肆批判。Heba Morayef 則是當時埃及人權觀察的領導，也是唯一被列入 Hellyer 詞彙表的女性，其領導抗爭童貞測試的社運。婦女在倡導男性權利也發揮很大影響。埃及人權倡議組織 (EIPR) 研究員 Dalia Abdel Hamid 是埃及境內少數批判 2017 年秋季對 LGBTQ 鎮壓的異議者。

女性也一直是埃及反對派媒的先鋒。 Lina Attallah 是 Mada Masr 的創始人和主編，Mada Masr 是一家新聞網站，「衛報」在 2015 年報導其在埃及新聞自由中的貢獻。Mada Masr 因為這樣被被政府封鎖，並且持續受到審查。

新一代努比亞社會運動者有幾位傑出的女性。Fatma Emam 於制憲法委員會中工作，並成功讓努比亞在埃及憲法中被提及。她是部落客和研究員，特別關注敏感的問題，包括軍方在蘇丹邊境佔領努比亞土地。2017 年春天，來自 Aswan 的年輕女子 Seham Osman 成為第一位宣布有意競選努比亞總統的女性，之前其因為受到關切而退出競選。

最後，埃及最著名的人權律師之一 Mahienour El Massry，她以捍衛所有埃及人的權利而聞名。其中一個案例包括 21 名穆斯林兄弟會的女性支持者。這很特殊，因為她本人是對兄弟會的大力批評者。此外，她也為敘利亞難民辯護，堅持在警察局旁邊過夜，確保難民不受酷刑或虐待。 2014 年，她獲得了 Ludovic Trarieux 人權獎。(曼德拉在 1985 年獲得了該獎項。)

如此簡短的文章其實很難公平地討論這個議題。許多的女性不能談論此議題。Nermin Allam 的女性和埃及革命是可以找到更詳細的分析。但是我希望女性主義不僅僅是倡導女性的權利而已。他們是更大鬥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將女性從革命歷史中抹去，或者將她們歸類於性別研究領域，其實只是讓她們一直以來反抗的父權結構永遠存在。■

來信寄給 Amy Austin Holmes <holmes@aucegypt.edu>

> 全球治理：

民主的世界秩序？

Peter Wahl, 執行理事, 世界經濟、生態、發展協會 (WEED), 柏林, Attac Germany創始人, 德國

Arbu繪。

20 世紀 90 年代有個概念相當風行：全球治理。這指涉了一種新形民主的全球體係，更人性化的全球化過程。概念本身的演變相當有趣。

首先，進行治理的不是政府。法國版本概念，gouverner，意味著轉向，調度，整理。內容上有下面幾個重點：

• 全球化的經濟過程和政治脫勾，導因於新自由主義的勝利，新自由主義要求市場的自我調控，自由化，私有化，去管制化。

• 新的全球化問題，例如氣候暖化等，解決方案超出了個別民族國家的能力範圍。

• 國家之間的問題，例如集體安全，軍備競賽，核能管理等需要採取新的取徑。

• 通過正式和有約束力的協議，以及非約束性標準制定，自願協議和多邊協議相結合，形成全球制度，形塑新的政治治理典範。

• 以上這些都需要國際體系中的行動者，也就是政府，多邊機構，商業部門和公民社會等的新互動，需要包容，合作，對話，連結，協商，利益平衡是重點。

冷戰的結束後，全球治理的概念似乎具有現實機會。全球治理有了舞台可以發揮，漸漸受到歡迎。1992 年聯合國里約會議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會議，有 100 多位國家元首和公民社會的人士，可說是全球治理的象徵行動。里約會議是「單一共同世界」論述的濫觴，可以和自由主義的世界主義和左派的國際主義結盟。

不過幻滅的也很快就是了。五年後的第一次評估會議上，明顯地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版本並沒有兌現其承諾。世界繁榮只是假象。反而有許多的到對。有趣的是許多受害者都是經濟不錯的國家，要知道當時許多受害者都極度右傾化。1999 年西雅圖世界貿易組織

>>

會議上的抗議就是最好粒子，越來越多的人發現了全球化的缺點，其中包括對社會公平，環境，民主的威脅。

換句話說，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版本贏了。2008 年，金融資本市場可以自我調節的說法破滅了。資本主義已經失去控制，導致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全球治理甚至無法影響這一進程，更不用說扭轉局勢了。

全球治理無法被落實到經濟領域，而全球治理的精神在國際關係中發揮不了作用。因此，1997 年為了對抗 Yeltsin 的俄羅斯統治，北約往東擴張。1999 年，當北約在沒有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再南斯拉夫開戰，這造成了一系列單方面強權政治和違反國際法的行為。 9/11 之後的「反恐戰爭」，以及全球「意願聯盟」對伊拉克的攻擊，2008 年北約保護下的科索沃的單邊宣告獨立，以及 2011 年利比亞政權的改變，這些都與全球治理的理念可會大大地背道而馳。

所以，若後來出現反作用，那也不用太驚訝。特別是俄羅斯中國越來越受到這些事件的鼓勵去擺脫冷戰後的秩序。這不是暫時的，是以國際體系的深刻結構轉型為基底的。 我們現在正在邁向多中心世界秩序的階段，幾本上中國崛起為超級大國，俄羅斯的國家資本主義也是，地球經濟重心整個轉向亞洲，以及 (相對) 對美國和西方主導地位的沒落。

國際上出現了新的秩序，例如上海合作組織或金磚四國。他們建立多邊金融機構，如亞投行 (AIIB)，要去取代國際貨幣基金，並設想像一帶一路這樣大規模的基礎建設經濟方案。伴隨著世界經濟中並行結構的出現，例如中國和俄羅斯的 SWIFT 替代系統，全球金融的電子神經系統，以及打破萬事達卡，Visa 和美國運通卡的壟斷的信用卡系統。這些新貿易協定通過雙邊協定去取代美元，從而破壞了美帝霸權。這是對全球化的反擊，其中一個重點是一種「選擇性去全球化」。

當然，新的世界秩序也可能有新的風險。於是移民和本土企業之間的競爭會導致衝突和不穩定。隨著川普政府極端單邊主義「讓美國再次偉大」，風險可謂前所未有。

如果我們問為什麼全球治失敗了，答案有幾個：

・我們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中的權力宰制忽視不見，馬克思說得好，經濟關係儼然是無形的暴力。

・我們對對國際體系中的政治權力關係也忽視了。

・我們對國家太樂觀了，資本主義仍然是典範。

全球治理從最早就太過理想化了。不過國際合作的想法仍然可行，不應該放棄希望，放棄結合理論和實踐。但是，如果要找到可行的替代方案，那是需要仔細想想要跟誰一起合作，以及怎麼合作去實踐。■

來信寄給 Peter Wahl
<peter.wahl@weed-online.org>

> 傑出的知識分子

Nicolás Lynch,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an Marcos, 秘魯

Aníbal Quijano於2015。Creative Commons。

Aníbal Quijano (1928-2018) 是秘魯和拉丁美洲的傑出知識分子，他很有原則。 當他在 20 世紀 60 年代和 70 年代從事社會學研究時，其對現狀的批評相當犀利。 Quijano 從未屈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危險和野蠻，在 20 世紀 90 年代，正值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影響力最大的時候，他對社會階層的批判解釋了當代秘魯和整個拉丁美洲的社會變遷，貢獻很大。

Quijano 主要在秘魯的 Lima 的 University of San Mar-

>>

cos 以及拉美和美國的其他大學擔任教授和研究員。由於他在 20 世紀 70 年代與 Sociedad y Política 期刊介入政治鬥爭，於是被 Juan Velasco Alvarado 的軍事政府驅逐到墨西哥，成為一位致力為秘魯以及全體拉美人民鬥爭的公共知識分子。他致力於找出形塑我們社會的社會和政治的深層因素，並探討其轉變的機制。

他的第一個貢獻是在認識論的層次。Quijano 為拉美的社會進程提供了「根植南方」的解釋。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他擺脫了功能論社會學的傳統 / 現代性二分法，並以歷史 / 結構異質性為主要論述主軸。他認為拉丁美洲社會中存在一系列生產是圍繞資本而成，這種現像不僅是國家的，也是跨國的，更是全球的。

因此，Quijano 解決了拉丁美洲依賴的問題。雖然他拒絕提及所謂的「依賴理論」，但顯然他是 20 世紀 50 年代由 Raúl Prebisch 和 CEPAL(英語為 ECLAC) 開創的論述的一部分，然後由 Cardoso 和 Faletto 傳承，最後由 20 世紀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 Ruy Mauro Marini 接下棒子。他參與當時的辯論，對城市規劃和勞動力做出了理論上貢獻，三十年後他通過權力殖民地的概念對拉丁美洲的全球特徵做出了深刻的解圖。

可是 Quijano 也對拉丁美洲身份認同問題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他在 20 世紀 70 年代早期在秘魯的 cholificación 之研究，到他對 José Carlos Mariátegui 的著作的關注。後者是偉大的拉美批判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此外，他也同情原住民的鬥爭以及目前由各種民族運動所促成的抗爭。

他在對認同問題上的貢獻主要是關於種族這個概念的思辨。Quijano 認為，這個概念起源於歐洲人對美洲大陸的殖民，然後成為美洲的社會的階級劃分基礎。身份認同奠基在種族上面，統治權力也是。總之，種族的概念是殖民政權的核心。 Quijano 認為，權力的殖民性來自外部統治的需要，殖民地或新殖民地的帝國霸權是統治精英對被殖民社會內部統治，之所可能是透過種族差異的建構。 所以，權力的殖民性成為在拉丁美洲本土民族主義或是多民族國家的主要威脅。

如同我們看到的，Aníbal Quijano 的理論創新和他在自主公民社會的思想中的地位，讓他成為秘魯社會學和拉美社會學的指標人物。■

來信寄給 Nicolás Lynch
<nicolaslynch54@gmail.com>

> 戰士的喜樂

Raquel Sosa Elízaga, 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 墨西哥

哥斯達黎加大學授予 Aníbal Quijano 榮譽博士學位，即使他是一位身經百戰的英雄也感到驚訝萬分。當時全部的人起立鼓掌時，他感到更加驚訝了。他非常感謝台下的觀眾「熟悉他的研究」，分享到：認識來自於生活「賦予一個人所思所著的意義。」他以謙卑和簡要向大家分享其座右銘「用力生活和抗爭。」最後補充說：「我們無法活在一個權力，剝削，暴力充斥的世界。」

我是很久以前認識 Aníbal Quijano 的，那時是 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他流亡來到這裡。他反帝，支持鬥爭，認為需要在美國，亞洲，非洲建立鬥爭戰線，他對全世界每一位女性，年輕人，原住民，移民，流離失所者和難民的鬥爭表示同情，所以他走遍世界，並在學術界以外相當受到歡迎。

他的抗爭史讓他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回到他的家鄉秘魯時，也就是獨裁者藤森命令軍方佔領大學之後，放棄了他在 University of San Marcos 的系主任職位。於是他再一次流亡 到 Binghamton University，巴黎，和其他地方。直到本世紀第二個十年開始，秘魯的 Ricardo Palma University 慷 慨地為他提供了一個可以成為他最後幾年抗爭戰鬥的規所。他的一生不停地組織抗爭和參與學術活動，涉足政治和教育，

「他人生的座右銘：用力生活與抗爭」

不斷向人們伸出援手。 他與許多與他一起參加世界社會論壇的知識分子和學者合作撰寫了許多文章，其中包括 Immanuel Wallerstein 和他的親密戰友 Pablo González Casanova。

他對殖民地的看法受到全球的認可，其思想根植於政治和學術上的鬥爭。 事實上，我會說那是道德的使命與召喚，是一個人的理想，尊嚴，是主體。 這是一種知識的召喚，一種方法論，一種抗爭的武器，為的是讓被的摧毀是爭的地方，被剝削的人民，被排擠的族群發出正義的聲音，對抗帝國無所不在的壓迫與剝削。

正如他系譜上的前輩知識分子，Aimé Césaire，Frantz Fanon， 特 別 是 José Carlos Mariátegui，Aníbal Quijano 為他的作品帶來了真正的歷史意義，顯示了自十六世紀以來世界革命的路徑，因為種族主義和奴隸制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驅動力。理解和譴責這種壓迫和異化永不停歇，是他日常生活的抗爭主軸。從潮流中解放出來，但不孤獨，超脫了政治迫害的痛苦，他是喜樂的戰士。他是一個快樂的人，因為他知道他正在為一個比他更大的理想而戰鬥。他喜歡生活的美麗，他的家人和他的朋友一起，感受到了無以倫比的抗爭與生活力量。讓我們慶祝他的偉大，決心，與正義！■

> 後種族隔離時代的貧窮

Joshua Budlender,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美國

Frederik Willem De Klerk和Nelson Mandela在1992年的Davos世界經濟論壇。圖：世界經濟論壇

很顯然的是儘管南非的黑人在 1994 年種族隔離結束時多數獲得了自由，但經濟自由仍未取得。 這種說法通常非常籠統，或是太過於學術抽象。我在這篇文章中提供證據，解釋南非貧窮問題的變化和趨勢。

> 後種族隔離時期南非的貧窮率

第一個也是最基本的一點是，在後種族隔離時期，被歸類為「收入貧窮」的南非人口比例幾乎沒什麼變化。具體數字取決於所使用的貧窮線為何，但通常 50% 至 65% 的人口被認為是「貧窮的」，這比 1994 年提高了僅有幾個百分點而已。但是貧窮率仍然和種族高度相關。 人口調查指出 73% 的非洲黑人，48% 的有色人種，12% 的印度人或亞洲人，以及 2% 的白人收入是低於貧窮線的。

貧窮人口的減少主要是由於政府提供了所謂的「社會補助金」，而這在後種族隔離時代擴張很快。這個補助金是給某些類別的窮人的現金，可無條件花用。對於南非最貧窮的 40% 家庭而言，社會補助金通常會佔到家庭總收入的一半以上。

後種族隔離時期物質條件的改善還有另外一個來源，大型公共項目提供了自來水，電力，和學校教育的可取得性，讓營養不良和死亡率顯著下降。這些領域的改善部分反映了極端種族隔離時代的對於特定族群的忽視和剝奪，但不可否認的是大有進步，特別是在農村地區更是如此。

可使雖然有這些重大改善，極端貧窮仍然普遍存在於農村，特別是過去曾經歷經種族隔離的「家園」。當用相對剝奪指標去看南非的貧窮時，最嚴重的貧窮地區往往是種族隔離的遺緒。

可是貧窮當然不僅僅是農村的問題而已。非城市的家庭要脫貧的機率稍微高過於濃村家

>>

庭，但仍有結構性的限制。城市黑人勞工及其家眷在種族隔離時代被迫遷移到遙遠的外圍，被剝奪都市的工作機會和便利。在種族隔離後，私人財產權和政府政導致了國家補貼住房建在廉價的外圍土地上。由於服務不足的公共交通系統加劇了這種情況，南非工人的通勤時間很長，通勤成本也很高。「運輸稅」因此高達工人工資的 40%。這樣「種族隔離城市」使邊緣人口很難生存。

> 工作少工資又低

南非的勞動力市場功能失調是種族隔離後貧窮持續存在的關鍵因素。雖然失業率吸引了媒體和政策制定者的關注，但是極高的數字讓這現象一點也不令人驚訝。按照「狹隘」的失業定義來說，南非的失業率在 25% 至 30% 之間。 根據「廣義」的定義失業率在 40% 左右。

大規模失業是不應被低估的，不過這個議題通常轉移了人們對南非超低工資的焦點。 家庭工資收入少家庭中，50% 南非貧窮線在貧窮線之下，雖然所得分配的頂端有所增加，但自 1994 年以來工資中位數一直停滯不前。民族誌研究也表明了南非工人經常辭職，主要是因為工資太低而無法支持物質和心理的花費 (通勤成本和歧視)，所以就算失業也就算了。

那麼，什麼導致了高失業率和低工資？多數人會說人力資本，即教育。這個說法認為南非正在經歷「技能不符」的情形，即雇主越來越需要高技能工人，但基礎教育無法訓練出這些技能。儘管入學率有在上升，可是南非基礎教育狀況百出。例如，每十名四年級學生中就有八名學生不具備閱讀能力。不過呢，教育不是問題的全貌。

要承認的是私部門對勞動力的需求並不充足。隨著種族隔離的結束以及 20 世紀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的勞動力供給增加，以前被限制移動的黑人可以有機會到城市尋求更好的生活。這時是勞動力的需求大過於供給，導致結構性失業鴻溝持續至今。雖然企業經常抱怨管理的風險很大，但數據說明了南非私營門的特點是工人流失率特別高。同時，對勞動力的不足的需求也可能與私營部門固定投資水平低有關。通過收購而非生產性投資去擴大業務，這種作法在後種族時代無以為繼，被大股東和海外資本轉移所取代，可是內需投資也沒有增長。

> 不穩定和動態貧窮

自 1994 年以來，南非一直遵循外包和「勞動仲介」的方式，導致不穩定的工作形式日益普遍。 對南非貧窮的動態分析表明，40% 的非貧窮家庭「容易受傷」，面臨著未來陷入貧窮的巨大 。80% 的貧窮家庭由於前途勘憂，被列為「長期貧窮」。

可以說的是，實質性經濟自由在南非仍然不存在：現實說明了一切。 然而，在南非，我們更要去想，解決此問題有賴對種族隔離經濟進行根本性的改變。 毫無疑問，社會補助金和服務的進一步擴張是可行的。然而，南非勞動力市場是經濟問題的關鍵，若要要破壞種族隔離的歷史宿命，那勢必要採取行動。■

來信寄給Joshua Budlender
<jbudlender@umass.edu>

> 後紓困福利政策

希臘的新貧窮地景

Vassilis Arapoglou, University of Crete, 希臘

牆上畫滿了貧窮的圖案，而餐風露宿也已經是常態。
來源: Vassilis Arapoglou.

經過八年嚴厲的撙節政策，希臘政府預計後救助時代並推動其「未來成長計畫」，這是一項與歐元集團，歐盟委員會，國際貨幣基金談判的計劃，關於退出財政援助計劃後續的財政監督形式。此計劃強調了希臘對改革的主導權力，試圖將「公平和包容性成長」設定為優先討論事項。

本文是要說明通過將該計劃納入更廣泛的框架，並呈現我最近對希臘城市貧窮研究的結果，比較政策的可行性。「後救助」論述可被視為「後福利」政策的一個特殊產物，這是一項社會權力向下開放的政策，已經在全球許多國家發展開來，雖然腳步不一，但是被歐盟採納了，用以改善勞動力市場的放鬆管制和社會權利的收縮。後福利涉及在社會安全網和社會包容計劃，鷹及國家，市場，公民社會的關係。社會政策的不妥切成了政治的焦點。一方面，新自由主義目的是地方和自發組織及其客戶轉變為人力資本，投資者和，和消費者。另一方面，漸進式的方法目的是反對這種自上而下的將福利措施，把公民社會納入市場。倡議的目的在於整合培力基層，在地資產和資金，在公衛、護理，住宅，經濟，城市生態等新領域注入能量。

在希臘，前兩個救助協議的目的是故意貶低勞動力和勞動人口價值。2010 年開始的壞經濟情況已經在過去兩年中減少，但是目前歐洲資本主義的組織方式，這種情況無法完全徹底根絕。以 2008 年的標準來看，2016 年的貧窮率接近 50%。這實際上意味著，如果我們在該

>>

國使用 2008 年的標準，希臘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貧窮之中。但即使使用目前的收入標準，年齡不到 25 歲的人口中幾乎有一半不是貧窮就是非常貧窮，在不然就是失業。年輕人的兼差行為暴增：25 名 25 歲以下的員工中就有一個是兼差的，五分之一的員工屬於新貧族。希臘退出了救助協議所以不平等加大，有一半的年輕人是貧窮或處於不穩定的生活狀態。新的貧窮最重要的是影響了年輕一代，移民，城市居民。

我近期研究的成果 (「Contested Landscapes of Poverty and Homelessness in Southern Europe: Reflections from Athens」一書) 說明了短是的政策如何主導宰了當地的反貧窮方案。引入「社會連帶收入」一計劃已經發揮很大影響力，但收入增長很有限，一味強調工作的方式限制很大，資源也縮減，在地和公民社會為了生存，要去想辦法怎麼吸引頭資。該強調的是，救助計劃不僅取消原本就不強的制度，而且還形成了一條特定路徑，讓公共設施私有化，慈善事業化。

最令人氣餒的是你會發現人們會在「新窮人」的群體之內去區分，且中產階級很能同意這種分類 (因為他們代表了一種貧窮的命運共同體)，被邊緣化人，是吸毒成癮者，精神病患者，非法移民，遷徙的人等等，地方政策不僅不能幫助他們解決物質上匱乏，而且還定義了貧窮人口的象徵分類，去避免中產階級的罪惡感和害怕。

相反的是，公民社會內部的多元使會讓人對市場邏輯和舊的濟貧法提出挑戰。希望的氛圍是有的，是為了讓那些無法被分類的人可以融入。非正式的支持也有用，在地的運動歡迎來到希臘城市的難民，反對矛盾的歐盟移民政策。

然而，「自發性」或「善意」並太好去改變，特別是當基層倡議面臨歐盟的懷疑，或是必須面對官僚體制的時候，特別是如此。和大眾看訪不同的是，公民社會歷史上活躍的領域，像是志願部門，專業協會等都會和基層倡議合作，國際宣傳組織或運動建立聯繫的領域，需要數年的經驗才能積累一定的知識。可是還有絕大部分並不沒有被發線。威權主義者和侍從主義者的心態仍然普遍存在於政黨內，把國家當作黨的延伸，貶低社會，迫使那些異議噤聲。

希臘「公平和包容的成長策略」可被視為改善政策，並去和歐州的制度進行協商福利的成果。公民社會團題則批判該策略不夠透明，沒有為改善貧窮問題制定具體目標，沒有宣傳有益價值觀，也沒有評估可能的社會影響。同樣地，「年輕人的經濟和社會融入」和「社會導向的經濟」等計畫沒有優先權，缺少支持。驚訝的是，及難民和移民融入的問題並沒有被彰顯。這些計劃確定了與委員會談判的議題，包括恢復集體議價和最低工資等等都是勞工運動者關注的問題。但是的反動的勞動立法，低收入戶和年輕的自營職業者的稅，以及延期退休金的刪減，並借貸方達成協議等等，都相當不容易。有鑑於此，地方公民社會去為政治和經濟權利的奮鬥是唯一的樂觀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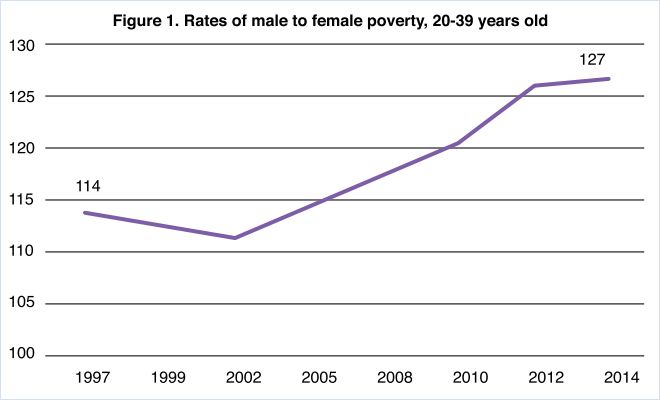
來信寄給 Vassilis Arapoglou
<arapov@uoc.gr>

> 為什麼拉美的女性貧窮比率教高？

Juliana Martínez Franzoni, University of Costa Rica, ISA貧窮、社會福利、社會政策研究委員會(RC19)成員

> 脈絡

從 1998 年開始到 2010 年中期，拉丁美洲的「左傾」或「粉紅浪潮」受到矚目。 選舉帶來了進步的動力，勞動權益和社會政策的要求日益增加。



來源: 以ECLAC資料為主的詮釋, CEPALSTAT, 2018。

左傾來自於人民對早期保守政府未的失望。幻滅與經濟繁榮共同出現。左翼政黨及其領導人表達了對改革的訴求，希望改善生活條件。到 2000 年，拉美其實取得了公共政策的大幅進步。

> 國家行動

粉紅浪潮期間，經濟政策和需求的勞動力市場政策進行了一番的改革，制定提高最低工資和增加正式勞動比例。社會公共支出占總公共支出的比例增加了，從 2000 年的 49% 增加到 2014 年的 58%。平均而言，加勒比海地區（拉美加勒比海經濟委員會）報告指出，人均支出從 2000 年的 687 美元增加到 2014 年的 1,619 美元。儘管各國的增長幅度各不相同，但整個地區都出增加了，新改革措施也有類似的變化。

社會支出的大多數都是有利於婦女的，並藉此取得國家資源。拉丁美洲的國家多數針對針對婦女和媽媽的政策進行介入。透過有條件現金轉移支付(CCTs) 和延長養老金發放率等政策讓婦女的收入增加了。這些國家政策與作為僅僅是丈夫家屬獲得的福利相比，是大幅改善了婦女按的生活條件，獲得老年福利的機會也增加了。此外，對於產婦的福利也增加了，慢慢地開始重新組織除家庭以外的的無常照護勞動的女性，勞動市場的增加後，婦女的生活改善了。

> 勞動市場和國家整併

2000 年代期間，對於受過高等教育的婦女有額度限制，女性勞動參率與總人數都因此減少，但現在受過高等教育的 24 至 59 歲的婦女之中，其勞動力參與率接近 90%。 所以女性勞動參與率的增加需要考慮教育程度較低的婦女。 可是這些婦女在進入勞動力市場也面臨結構性障礙。女性的總體變化模不完整，但收入不平等也在女性群體中也有異質性。

21 世紀初基於不同的原因婦女勞動力的參與率在低收入和高收入婦女中有了障礙。最糟糕的情況是性別分工早其和較高的生育率，有限的照顧勞動市場和資源等等導致了參與率達到頂峰。性別分工讓受過高等教育的婦女通過降低和延遲生育率去市場獲得照護服務，好達到男性的勞動力參與率標準。

家庭結構的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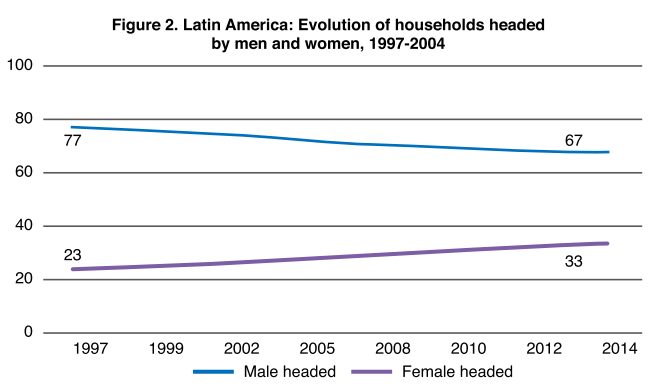
拉丁美洲在第二次人口革命之後，家庭結構也經歷了徹底的改變。新夫妻

>>

關係代表了更多的家庭組成和退場機制，以便享有更好的權利和責任分配。雖然家庭數量較少，不過重點是既有的家庭並不穩定且容易瓦解。

隨著家庭的減少，核心家庭也減少，單親家庭，同居，同性伴侶和其他家庭形式增加。離婚率的提高是這些轉變的一個指標。圖 2 代表了了雙親，丈夫為主的家庭比例的下降，妻子為主的家庭比例的增加。根據定義，家庭單位既合作又衝突。家庭制度的變革挑戰了由成年人共同養育後代和照顧彼此，防止後半生風險的家庭制度。，這突顯出了新舊制度之間的衝突。結果是與父親生活在同一屋簷下的小朋友人數增加了。

家庭制度的轉變對所有人都有重大影響。國家總體經濟統計顯示了拉丁美洲的兒童和青少年的消費來源至少有 60% 來自私人轉帳。兒童的經濟保障和照顧母親大有關連，這通常也關係到兒童的監護人。婦女照顧，養育孩子，健康檢查等的一系列育兒責任都受到影響。這樣的需求，加上價值和消費來自家庭，通過女性的無償照顧勞動和家務勞動得到補償勞動力缺口。研究指出無論



來源: 以ECLAC資料為主。

收入，年齡，家庭結構怎麼改變，都沒差。

婦女的勞動力市場參與與變化受到影響很大，男性呢？男性在勞動市場參與上幾乎沒有變化，女性反而在無償照護和家務勞動率增加兩到三倍。此外，當家庭瓦解後少有孩子與父親同住。這種不平等的家庭勞動分工對婦女的資源取得有負面影響限制了婦女的勞動力市場參與 (例如有償工作) 並要和事業保持距離以適應家庭需要。收入差異也限制了婦女將其無償家務勞動部分轉為有償家庭工作，也包括女性工作的能力 ，這是拉丁美洲不平等收入的核心特徵。

> 啟示

家庭結構改變了之後，更多的父親放棄了夫妻關係之外的角色。而國家直接介入兒童的物質福利，產生了對適應國家法律和政策的需求。國家發展那些能夠讓越來越多離婚家庭，單親家庭，雙薪家庭，同性伴侶家庭，以及更多易受貧窮影響的兒童和婦女的需求的政策面臨嚴峻挑戰。此外，這種廣泛的家庭結構相關的法律承認和平等權利要求國家的介入，讓家庭和國家可以合作，超越反貧窮現金轉移取徑。 總而言之，這對包括左翼政黨在內的所有政治行動者來說都是一個新的挑戰。■

來信寄給 Juliana Martínez Franzoni
<juliana.martinez@ucr.ac.cr>

> 「慈善經濟」

在福利國家的陰影下

Fabian Kessl, University of Duisburg-Essen, 德國

在德國，數以百萬的人使用濃湯廚房，慈善衣服，食物分配點數，食物銀行。Creative Commons

2017 年 12 月，德國 Essen 的一個食物銀行 Tafel 的董事會決定限制移民顧客的服務使用。因為一位年輕移民的不當行為，食物銀行拒絕讓沒有德國護照的人進入。這種種族化的限制引起了國際的注意，其種族主義的傾向遭到嚴重批判。Essen 的例子顯示了社會問題的本質，因為問題並不是關於 Essen 的貧富差距，而是一種新的差距：「進出」的差異，也就是「貧窮的養老金領支領者」和「自信的年輕移民」之間的對立。在民主社會的脈絡下，其轉變是必須被公開和學術地討論的。然而，在這個辯論中仍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是歐洲大城市的地方食物銀行的。要知道，這場辯論觸及了為什麼 21 世紀的人在德國或其他歐洲國家和北美國家會使用食物銀行這樣的問題。

德國的食物補助官方數據僅僅是根據德國食物銀行協會 (Tafel Deutschland e.V.) 等國家協會的內部資料。該協會報告指出，2016 年有 934 家地方食物銀行，但這只包括成員數量。若我們納入那些對於服務「有需要的人」的組織，我們會發現歐洲各地有更多類似的組織。德國就有數百萬人就使用是濃湯廚房，慈善衣服，食物配送點，以及其他食物銀行。我們的研究發現在德國的 16 州中，只有 5 州可以找到大約 5,000 到 6,000 個類似組織。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 (或更早在美國) 建立了一個新的扶貧體系，該體系可稱為「新型慈善經濟」。

>>

「新的慈善經濟」指涉了一種再分配體系，其中的基本商品免費，或是通過志願者或低收入者打折賣給「窮人」或「有需要的人」。系統依賴於從以下三個來源去提供日常消費品：工業生產過剩產品，因法規而無法再銷售的商品；二手的商品。

「新型慈善經濟」主要是服務那些沒有資金參與資本主義貨物分配製度的人。可是，該新經濟型態主要是為日常生活基本商品，所以，這種形式曾是福利國家的專利 (像是在二十世紀中葉歐洲或北美)。福利國家的社會保護體系中，因為法律要求的物質供給缺口主要通過現金和服務補足，可是「新型慈善經濟」將非貨幣利益與法定社會保險，供應或福利結構結合起來補貼有需要的人，甚至會取之代之，起可用性不是基於權利，而是基於接受慈善捐贈的善意。「新的慈善經濟」透過這種改變將減貧轉變為扶貧：捐助者和幫助者都是以同情為基礎而不是「陌生人之間的團結」(Hauke Brunkhorst)。這種型態允許人們短暫關注他人的貧窮問題，而不是制度性的支持其脫貧的權利，這是所謂的「新型慈善經濟」。

可是，如同我們從工業主義的到的啟示一樣，慈善不僅是以忠誠和同情為基礎，「新型慈善經濟」也是種次要經濟體系。慈善經濟與市場經濟是密切相關的，促進了剩餘價值的再利用。這種再分配對於捐贈基本產品的人來說是有經濟利益的，因為他們的捐款獲得了相同的利潤。 例如，食物折扣店仍然可以從捐贈的商品中獲利，因為 (a) 它可以降低處理成本，並可能節省一些稅收；(b) 作為贊助者的企業可以通過捐贈去實踐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形塑正面的公共形象。

因此，「新型慈善經濟」顯示福利國家的的陰影。與公眾形象相反，食物銀行，濃湯廚房，慈善衣服等並不是公民社會唯一的自發行動。我們的研究發現德國的「新慈善經濟」中 90% 的組織提供物質援助和廣泛的社會服務，這和正規福利國家有很強的聯繫，因為通常是贊助，公共資金，會費，利潤或服務費。還有對捐贈者經常進行經濟狀況調查，「新型慈善經濟」與福利國家的服務體系聯繫起來的正是公部門對個人情況的評估結果。在公共社會和福利機構與「新型慈善經濟」服務之間的間接合作中可以觀察到這種情況。例如，就業中心和職業介紹所的工作人員會向有需要的人告知哪裡有服務提供點，例如食物發放。這建立了一種新的輔助關係，即較小的單位在下一個更大的單位前提供援助。公共行政人員將「新慈善經濟」的服務理解為福利國家福利的補充 ，甚至是替代，即使沒有法律基礎。

「新型慈善經濟」很可能會成為公民社會，經濟，國家之間新的分工的典範，其各自的界限和行動邏輯都有重疊地帶。 因此，我們正邁向幫助那些需要被幫助的人的正確道路上。■

來信寄給 Fabian Kessl
<fabian.kessl@uni-due.de>

> 食安的論述

對於21世紀的挑戰

Mustafa Koç, Ryerson University, 加拿大, ISA遷徙研究委員會(RC31)和農業與食物研究委員會(RC40)成員

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的全球金融危機期間，食安搖身一遍成為顯學，成了全球解決所有人食物供應和可取得性的最首要的事情。聯合國食物及農業組織 (FAO) 在 1996 年世界食物全球大會上定義了何謂食安：「無論何時何地人們的食物都是安全的，包括物質，社會，經濟上都可取得安全和營養的食物，滿足營養需求和健康生活的的標準。」「

雖然 FAO 等國際組織都普片認可，但食安仍是個令人困惑的概念，因為其多重定義和優先順序這幾年來變化不斷。 食安論述的這個特質也反映了市場經濟中應該怎麼管理食物獲取和競爭，以及食物供給系統之改變，以及政策上的搖擺。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食安的概念受到了來自新自由主義，全球經濟，國家等的影響。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自由主義政策被用來解決金融危機，削減社會福利支出，影響工作條件，國家在經濟的角色限縮，去管制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盛行。這都導致製造業蕭條，而且非正式勞動集中在服務業。社會福利削減讓事情更遭，導致貧窮率和食物風險率上升。

新自由主義的食安論述從早期的權利論述演變成市場導向的論述，食品變成商品，食物風險視為個體的歸因，和農業食品系統無關。1993 年世界銀行的報告清楚地可以看到這個轉變:「食品實際上就是商品。」隨著福利國家縮小，國家的福利都轉嫁給地方政府，社會補助則交給了公民社會組織 (CSOs) 和家庭。食品銀行開始出現，填補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留下的空白。食品銀行於 1967 年首次在美國成立，其與社會福利機構不同，不透明，缺少課責性，但其在世界各地普及起來，為「剩餘人口」提供「剩餘食物」。

在市場經濟中，產品為人類消費而生產，使得不能在市場上賣出的產品成為過剩。於是為了解決食物浪費和貧窮的問題，就是剩餘食物的再分配。然而，這美好的想像通常忽略了政府削減社會補助的影響，以及農業食品公司在食物風險提高中扮演的角色。40% 的食物被丟棄掉相當浪費，減少浪費可以讓我們養活很多人，但是食物不安全的原因不是由於食物短缺，而是不平等。目前世界上多數的穀物和油籽都被用來製作動物飼料，生物燃料，以及工業產品，如果糖，玉米糖漿，但沒有被做成食品。因此，減少食物浪費需要對農業

>>

的利潤取得結構和部門補貼的影響進行減至，看如何影響了食物和飢餓的再生產。

> 進展不順

1996 年的世界食物大會上，大會承諾到 2015 年會讓營養不良人口減少一半。當時估計暴露在食物不安全之下的人為 7.99 億。2009 年，這個數字達到 1,023 億。FAO 在 2012 年通過有所回應，透過採用新政策，2015 年營養不良人口減少到 8.15 億，並不多。此外，非洲和中東由於戰爭和武裝衝突，營養不良人數很多。近幾十年來，世界不同地區的武裝衝突使數百萬人成為食物不安全的人口。根據 FAO2017 年的統計，世界上 8.115 億長期食物不安全和營養不良，60% 的人生活來自戰亂國家。約 75% 因營養不良而發育遲緩的兒童是來自戰亂國度。由於戰爭破壞國內經濟，基礎設施，導致數百萬人成為難民，而在各自區域內遏制人口流動的企圖已使鄰國成為難民營。巴基斯坦和伊朗的 600 萬阿富汗難民以及土耳其，約旦，黎巴嫩，伊拉克和埃及的 560 萬敘利亞人只是近期大規模區域人口遷徙的兩個例子。雖然難民長期暴露食物不安全和營養不良，但他們也成為東道國食物不安全和政治不穩定的根源。

> 未來的食安威脅

到 2050 年世界人口將上看 90 億。隨著發展中國家的浪費消費模式和全世界的戰爭帶來了難民，食物不安全程度可能會糟。目前為止，我們尋找提高生產能力和改善弱勢群體獲取食物的方法，試圖通過工業化耕作方法提高生產能力，導致更有效率的生產食物，並使數百萬農民和小農戶遷入城市。化學肥料也造成了重大的環境問題，例如土壤退化，空氣和水污染以及生物多樣性的喪失。約有 13% 的溫室氣體排放來自於此。氣候變化影響的增加對全球的生產能力構成了另一個威脅。在尋求新政策以改善食品的可獲得性和可獲取性以及減少損失和浪費的同時，我們可能還需要挑戰質疑我們現有的飲食，消費習慣結構，以及上個世紀普遍存在的農業食品系統的組織。

新興的食物自主權運動組織了農民，工人，消費者，努力建立替代食物體系。雖然食物自主權與的以前的食安論述有一重疊，但是其強調各州在確定國家 / 地方邊界內的食物供應條件方面的作用，包括對全球化的抵抗。其和新自由主義對食安論述不同，食物自主性的論述框架認為食物是人權，強調當地人民擁有和控制土地，水，資源的重要性，也強調可持續性和彈性，而不只重視效率，並請拒絕使用食物作為武器。與食安一樣，食物自主性論述是動態的，流動的，由不斷變化的政治和經濟歷史所塑造。觀察食物自主性在重建公眾對食物系統優先事項的看法和重新定義食安方面的作用，將會是有趣的研究。■

來信寄給 Mustafa Koç
<mkoc@ryerson.ca>

> 全球現代性

Sujata Patel, 印度高等研究院, 印度, ISA社會學歷史 (RC08), 都市和區域發展(RC21), 概念社會學(RC35), 歷史社會學(RC56) 研究委員會委員, RC08執行委員

自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全球現代性」被使用於討論全球化理論的本質和內涵，時常出現在文獻中。這個概念有兩個意含，第一是全球化，第二是現代性，兩者在每自相互連接時也重構了理論本身。

全球現代性理論其實一開始出現在主流社會學文獻中，其探討了經典理論在評價全球北方當代變化中的重要性。這個討論也牽連到了後來的學術討論，例如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所發展出來的現代化理論是奠基在經典社會學架構和歐洲經驗之上的，而這是否可以持續用來解釋世界上各地的現代性，是需要被討論的。後來大家意識到所謂的現代化模式相當同質化，有歐洲中心的成份，世界必須要以歐洲經驗為典範，歐洲於是具有主導權。這些學術性討論讓我們知道我們需要的是新的觀點，取代歐洲中心的現代化理論同質性假設並且承認現代性在全球上的異質性。

主流社會學對這個立場的接受有如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因為其允許從不同系譜的觀點去對現代性進行討論，像是韋伯，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然後並將這些與其他在全球北方以外所發展出的理論放在同一個層次上檢視，也就是稱為本土理論或南方理論。這種新觀點的出現讓討論的視野擴大了許多並且形成了一個獨立研究和反思的領域。目前，全球現代性的學術文獻聚焦在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的議題，並且拓展了社會學學的基礎。持續的辯論仍發生之中。在這篇短文裡，我將闡述自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以來出現的三種現代性理論：本土理論，南方理論，以及解殖民理論。

> 多重現代性

多重現代性理論有多種變形。此概念由Shmuel Eisenstadt發展出來，他是這個理論的始作俑者，將現代性與文明研究闡連，可是，這種觀點也關於了試圖讓現代性和文明脫勾的理論家，其有下列假設：a) 現代性不是單數，而是複數。b) 雖然現代性的再現或許相似，但是其差異是奠基在文化脈絡上的。 c) 為了理解其中差異，我們必須重構社會學的新典範。

所以多重現代性的討論一開始是以歐洲經驗為基礎的，是在討論歐洲不同的現代性經驗的背後的組織方式，做出歷史和哲學的提問，並關心這些差異是否能透過一個架構去理論化。再者，學者們也試著將現代性核心的理論成份與其邊緣成份相對立起來。Eisenstadt認為，現代性的核心是人類的能動性，能動性一種自主，理性，創造，和自由的能力。此外，如果能動性是關鍵，那麼這個關鍵在世界上的再現會如何不同呢？Eisenstadt論證認為這個核心，也就是人類的理性能力，起源於軸心世紀的文明。而在基督教歐洲軸心文明中，現代性第一個出現，然後傳播開來。這種西方模式一開始並不被接受，並且其文化屬性被選擇，重新詮釋，和重新建構，成為其他軸心世紀文明的特質。後來核心的特徵浮現，成為了現代性的後來核心。因此，儘管某些制度上如職業，教育，城市發展，全世界總會有同質性，但是異質性

>>

「我們必須去重構現代性理論，因為主流的西方論述把主體經驗科學化成為客觀的普世法則。」

不可避免，因能動和結構相互形塑。

也有人認為多元現代性理論促成了當代社會理論的文化轉向。由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現代性的討論中，現代性有任何代表性。 此外，雖然本論文主張歷史性，但沒有提及殖民主義，其現代性的組織，其剝削過程，以及它與知識體系的關係，尤其是社會科學的關係。 下面討論的觀點解決了這些問題。

> 本土理論和南方理論

本土理論首先假設社會科學在地方上設定研究議程的能力方面必須要有自主性。Raewyn Connell 認為北方和南方的不平等權力分配導致了北方理論的普遍性預設。在南方的理論研究中，有兩個概念描述了這個現象。 第一是由 Paulin Hountondji 提出的「外向性」，他將其指涉社會科學的外向性。第二是 Syed Farid Alatas 所提出的「學術依賴」。 後者認為西方知識是霸權，所以是去脈絡化的。於是學者們認為有必要從「本土」敘事和文化中構建替代版本社會學。

本土理論認為，若社會科學通過與其哲學發展出西方社會科學，那麼應該也可以和非西方的哲學文化互動產生非西方的社會科學。其希望產生自主性，抗衡西方主流認知模式。 並且聚焦在本土歷史和社會的脈絡，在西方或北方社會的「普遍法則」論述典範之外制定社會學的「替代」版本。

由此而言，我們發現有三種立場。 第一個是由奈及利亞社會學家 Akiwowo Akinsola 所論述的，其肯定社會學可以從其人民的敘事，神話和諺語以及「真正非洲智慧的規律性」中去形塑而成。這派學者匯集了從奈及利亞 Yoruba 部落的詩歌中萃取社會學理論，認為這種詩歌中的原則載明了社會生活的單位是個體，而個體因為「物質需求而與其他個體交往」，基於共同利益的社群生活對個體的存在具有重要意義。但是這個觀點由於其所代表的各種方法論和認識論問題而受到質疑，例如用庶民文化去構建社會學理論知識，其翻譯和詮釋的「真實性」，以及是否可以通過科學的檢驗等等。

本土研究的第二個立場是試圖回答這個問題：新的知識體系是否可以通過科學方法的檢視，於是認為西方科學不是唯一的科學體系。Syed Farid Alatas 論證了一個既相關又重要的自主社會科學系譜，透過質問是否可以使用不同的文化及其認識論來重構新的批判性科學去解決本土理論的問題。其認為，本土知識體系，例如伊斯蘭教的知識體系，在其中具有可批判性。其認為這些原則也可以於重構社會學方法。問題是，伊斯蘭教如何在不承諾伊斯蘭社會學或伊斯蘭物理學的前提下為新的知識體系提供形上學和認識論的基礎？這種質問並不意味著放棄科學，特別是批判性，而是擴大範圍，融入來自非西方文化的批判性理論系譜。

本土理論的第三種取徑來自 Linda Tuhiwai Smith 的研究，其認為西方科學是考察的重點，認為有必要取代其西方科學實踐，因為這些使得主體成為研究對象。西方科學通過不涉及內部知識論的討論，將「普世法則」強加給世界各國人民和地區。其建議要重新研擬科學的方法論，論證去建立一種對個人，社群，和文化價值有細緻認識的科學。她要求研究人員思考如何處理所謂客觀主義研究，並將從屬 / 本土的聲音納入研究。

這三個立場的根本是南方的學術實踐的問題。以馬克思的觀點來說，社會科學需要改變世界，而不僅僅是對世界進行解釋。所以從而出現了一種更具革命性的立場。

> 解殖民主義觀點

解殖民主義理論，又稱為解殖民主義現代性研究綱領，是源自於拉丁美洲的知識分子運動。 其借用了多重領域的理論，包括依賴理論，解放神學，拉美社會運動理

>>

論。其範圍很廣，認為有必要對歐洲現代性理論進行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批判，進而建構新的知識體系。它主張透過新的認識論去重構社會科學，這些假設可以將現代性的探究延伸到「思想國界」以外。

其一開始認為，現代性理論和社會學中的主要斷裂是理論語言中對於解殖民經驗的忽視與刪除。這導致了現代性理論以族群為中心，也導致了歐洲中心主義。 對去殖民主義者來說，歐洲中心主義是一種鑲嵌在所社會科學中的的知識體系，特別在歷史和社會學中。 有三個立論可以解釋這個觀點：Aníbal Quijano 理論化的「權力殖民」; Enrique Dussel 概念化的「內在性 / 外在性」; 和 Walter Mignolo 構想的「殖民差異」， 三者有所重疊。

Quijano 的認為，權力的殖民性建立在兩個以歐洲為中心的迷思上：演化論和二元論。 首先，演化論將歷史理解為線性的發展。這種線性使觀在歐洲現代性的理論早期發展階段概念化，並且在被用於解釋非歐洲世界的歷史經驗時被強化了。再來，二元論是歐洲中心主義用來區分歐洲歷史與社會與非歐洲歷史與社會的理論工具。透過二元論，歐洲中心主義將非歐洲的知識視為他者，使得歐洲歷史與社會變成為比較優越的經驗 (因為它創造了現代性)，而其他則是劣等的。

持有權力殖民性的學者認為，歐洲中心主義預設並證成了以下的權力控制機制：a) 經濟上透過土地取得，勞動剝削，自然資源控制， b) 軍隊，警察和政治制度的權力佈署，c) 通過家庭和教育體系的性別和性行為，以及 d) 透過闡述認識論 / 知識體系的主觀性形成霸權。

Walter Mignolo 關於被殖民經驗差異的說法 (現代性與殖民地的區分，還有進一步在知識建構上的分野) 延續了「權力的殖民性」的觀點，並將其視為為是歐洲人的特權知識和政治空間的認知工具。Mignolo 認為這樣一來可以理解被殖民經驗和被殖民者的想像與知識的從屬性。

Enrique Dussel 重槓了 Quijano 的演化論迷思，認為當代歷史論述被設計為從歐洲地區歷史向外延伸身，這是一種本質化的內在性理論，讓人以為歐洲歷史有普遍性。他認為當代的研究需要的是一種現代性的外在性理論，從一種解殖民的立場來觀看非歐洲的世界。 我們需要重構社會科學裡的哲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的認識論假設，代換成去殖民的視角。 這是相當有野心的研究議程，其企圖購購 18 世紀後期形成的當代社會科學知識基礎，並重新定義研究主題，專業性，和問題，翻轉正個代當社會科學的基礎。■

來信寄給 Sujata Patel
<patel.sujata09@gmail.com>

> 我們(何時)重要嗎？

回顧波蘭社會學

Marta Bucholc, University of Bonn, 德國, University of Warsaw, 波蘭

Leon Petrażycki 和Florian Znaniecki, 兩位波蘭社會學家

波蘭社會學的歷自始便是國際與在地之間的緊張所形塑出來的。這個緊張很少有協商的空間，因為它牽涉其深層的學科認同，然後轉化為研究的，理論的，制度的，和生命傳記的策略。

持續的緊張局勢部分導因於波蘭的社會學基本上是舶來品。儘管在 18 世紀晚期和 19 世紀的前波蘭領土上有許多社會思想 (這個國家在這個時期並不存在)，但它通常是私人研究興趣。當社會學制度化後，該學科很快地沿著幾條不同的路線發展。其傳散過程和國家學術的傳統相互影響。我們很難去講 Leon Petrażycki 或 Ludwik Gumplowicz 等作者的貢獻。其高度原創性與當地文化和政治利益相互作用，反映了對跨國學術的影響。此外，中歐和東歐學者對整個社會科學發展的影響不成比例地大，這由於 1918 年以前進入歐洲帝國科學網絡的阻礙是相對低的。

地方和跨國科學網絡中的雙重經驗反應在早期波蘭在西方受過教育的社會學家，像是 Florian Znaniecki 和 Stefan Czarnowski，他們的研究必須放在波蘭民族國家重建的脈絡下來看。那時西方社會是普世的，成為一種新的科學，新的思考模式，新的職業，新的知識分子風潮，新的政策制定工具。對於新學科的渴望保持了溝通的管道。十九世

>>

紀的波蘭文化可說是全球的在地故事，而成為社會學家是實現此目標的方式。

波蘭社會學家於是能夠宣稱其研究成果的普遍性，在20世紀80年代達到高峰。因為具有「Solidarność」印記的波蘭有重要地位，所以這在理論上也是很有影響力。只是新鮮度很快不保鮮，好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社會學有了新生命：1989年之後，每個人都對後共產社會感興趣，雖然波蘭只後社會主一國加的一個？。

某種意義上而言呢，波蘭社會學要感謝最近的民主倒退浪潮，這讓社會學重拾了這方面的研究興趣。國外當我們被問到1989年之後出了什麼問題的時候，透過回答這個基本上的地方問題，我們的研究可以位民主法治，文化戰爭，民粹主義反革命的普遍性議題有所貢獻，地方經驗可以也是有普遍意含的。

但若假設可以反民主潮流可以受到控制然後秩序恢復讓波蘭社會重新進入2007年之後達到的平穩階段，那我們怎麼行動？目前為止，波蘭社會學很大程度上是研究自認為非正常社會的一門學科，研究者在現實和想像上都不太正常。社會學家以波蘭的例外主義當成是常態，希望例外狀態會變成正常狀態。可是這意味著我們必須找到其他方法來解決問題。

挑戰並不是沒有用的。19世紀知識分子面段的道德兩難是壓力的根源，現在也意外得到了新自由主義科學和高教管理主義的支持。保守政府順利和新自由主義接軌。我在「Sociology in Poland: To Be Continued?」(2016)一書中認為，調解國際與地方之間緊張關係是波蘭社會學的唯一出路。對於誘惑的抵抗是很關鍵的，因為我們很清楚，我們的社會對我們來說並不是因為對其他人來說很特殊而才對我們自己很重要。■

來信寄給 Marta Bucholc
<mbucholc@uni-bonn.de>

> 波蘭和德國的青年不穩定勞工

Jan Czarzasty, and Juliusz Gardawski, Warsaw School of Economics, 波蘭, Adam Mrozowicki, University of Wrocław, 波蘭, ISA勞工運動委員會(RC44)委員, Vera Trappmann, Leeds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英國

大量資料說明了歐洲年輕世代的不穩定性日益增加，因為臨時和非自願兼職工作的增家，工會密度下降，畢業找工作的過渡性困境。PREWORK 研究計畫主要研究歐洲國家，德國和波蘭。德國是市場調整經濟的代表(CME)，保障工人權益。可是 2000 年代的勞動力市場改革也增加了臨時契約工，勞動力市場的二極化，工資停滯，工會的特別談判。波蘭則是更接近自由市場經濟(LME)，目的去實現勞動力市場靈活化與相應的修法。

兩個國家的年輕人在勞動力市場都處於不利地位，臨時就業的增加 (在波蘭)，貧窮和低薪工作的風險增加 (德國)，兩國的經濟風險都很大。青年不穩定性可以從不確定的就業看出來，生活工資的損失，社會的嵌入性，完整的社會權利。失去認同和社會融合構成了不平衡的主觀認知。可是雖然如此，但是青年人對抗不穩定的集體動員仍然有限，他們對生活的總體滿意度仍然很高。問題是，越來越不穩定的工作條件，社會意識和年輕人的生活策略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波蘭和德國的年輕工人怎麼看這問題？他們是

>>

否解讀成是規範，是個人需要適應的工作環境的部分？

PREWORK 計畫聚焦在兩個層次：(1) 調查波蘭和德國的不穩定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對不穩定工人的社會經濟意識，(每個國家 N = 1,000，隨機抽樣的 年齡 18-30 歲)。(2) 調查波蘭 (60 人) 和德國年輕不穩定工人的 120 多次傳記敘述訪談，瞭解不穩定就業和青年人生活策略與職業選擇之間的關係，還有其集體動員 (和去動員) 的形式，年齡介於 18-35 歲之間，必須從事非正規工作，失業，或不穩定的職業教育 (職業教育訓練)。

我們提供一些初步的觀察結果。量化研究揭示了對不穩定的主觀看法：48.8% 的波蘭年輕工人波和 31% 的的國年輕工人覺得在不穩定的環境下工作，低工資或是臨時契約。 然而，兩國青年的經濟態度並不相同。

與我們的假設相反的是，波蘭人和德國年輕工人的不穩定地位對他們對經濟的規範性看法沒有太大影響。我們假設擁有臨時契約的工人會支持國家強力干預經濟和支持平等主義，這在我們研究中利用 15 個變數去測量德國。波蘭只有五個變數，結果顯示永久合約和臨時契約工的差異有統計顯著。另外，臨時契約工子擁有長期契約的人更放寬對經濟的看法。在德國，差異更明顯。臨時契約的工人對政府干預經濟的原則的支持率稍低 (33.8% 對 24.8%)，但這些人傾向於社會平等主義 (分別為 69.1% 和 65%)。年輕波蘭人的經濟立場是支持「國內資本主義」(對波蘭公司和國家經濟規則的放行)：53.4% 的波蘭受訪者更喜歡自願而不是強制性的養老金。只有 12.3% 的德國人贊成。年輕德國人的經濟意識更接近市場調整經濟 (CME)，支持共同決策，稅收政策對收入差異的補償，歐洲工人的自由移動 (德國受訪者的支持率為 88.7%)，相比波蘭的 66.6%，是蠻大的。年輕波蘭人的觀點更接近自由市場經濟 (LME)。

質化研究為我們提供了與工作相關經驗的生命經驗。我們建構了六種不同類型的與工作相關的生活策略，這些策略與應對不平等的形式。「勞動者」渴望穩定和可預測就業的預定藍領工人 ，要提醒的是，職業彈性不是制度的接受，而是通過其他非工作相關領域的穩訂來調整和應對。「專業人士」是渴望獲得更高收入和美好前途的穩定全職工作的白領階級，將不平等合法化。「創意人」有不同的方法讓他們在非政府組織，創意職業和文化部門開展，他們認為彈性是免於必要的。最後，「被阻擋」的類型是不確性，是由於心理問題或拒絕保險。而「被取消」類型的特徵是從未獲得正常工作的類型。

量化和質化結果顯示兩國的年輕人都感到很不穩定，但不會批評或質疑不平等的分配。 大多數年輕人似乎已經習慣不平等，因為他們認為這個生命階段由於他們正在進行的投資，最終會得到回報，所以認為不穩定是暫時的。這也讓工會動員率下降。易言之，不平等正在「正常化」，年輕人事為沒什麼。■

註 1： 本文是 PREWORK 計畫「波蘭和德國的年輕不穩定的工人：關於工作和生活條件，社會意識和公民參與的比較社會學研究」的部份，由波蘭的國家科學中心和德國研究中心 (DFG) 支持。德國的研究團隊包括 Vera Trappmann, Jule-Marie Lorenzen, Alexandra Seehaus, Denis Neumann。波蘭團隊包括 Juliusz Gardawski, Adam Mrozowicki, Jan Czarzasty, Magdalena Andrejczuk, Aleksandra Drabina-Różewicz, Jacek Burski, Mateusz Karolak, Agata Krasowska。

來信寄給
Adam Mrozowicki
<adam.mrozowicki@uwr.edu.pl>
Jan Czarzasty
<jczarz@sgh.waw.pl>
Juliusz Gardawski
<jgarda@sgh.waw.pl>
Vera Trappmann
<V.Trappmann@leeds.ac.uk>

> 為什麼人民投給右派？

Katarzyna Dębska, Sara Herczyńska, Justyna Kościńska, Kamil Trepka, University of Warsaw, 波蘭

PiS有廣大支持，但也有很多人反對。Flickr/ Platforma Obywatelska RP。

Arlie Hochschild 在 2016 年的《全球對話》解釋說社會學家若要去回答本文的標題問題，那麼必須從鑲嵌在經濟重分配的情緒和傳記中去找答案。我們的團隊從類似的直覺中進行了研究 (作者 Maciej Gdula 教授作是主研究員，加上 Stanisław Chankowski, Maja Głowacka, Zofia Sikorska, Mikołaj Syska)，我們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也就是 PiS 自 2015 年起為什麼能夠成為波蘭執政黨？ PiS 一般說來被認為是社會保守黨：在價值觀方面保守，經濟方面希望國家管控。雖然 PiS 在歐洲懷疑論者和民族主義者的立場上受到來自歐盟和波蘭社的批評，不過其支持度一直在穩定成長，2017 年底其支持度破半了 (50%)。

> 研究簡介

我們的研究是在波蘭中部的一個縣進行：「Miastko」(波蘭語中的「小鎮」)。執政黨在 2015 年在 Miastko 得到 50% 的選票，全國得票率 37.6%。這讓我們寫了這份研究報告：「從小鎮的窺探波蘭政治中的新威權主義。」自 2015 年 PiS 都使用了「變得更好」的競選主軸。

為了研究 PiS 支持者的政治態度，我們訪問了 30 名 Miastko 的居民，共兩波訪問：第一波是聚焦在生命傳記，第二波是關於他們對墮胎或福利國家政策等問題的意見。我們採用了 Bourdieu 的的階級差異理論以及 Maciej Gdula 和 Przemysław Sadura 的波蘭經驗回應。受訪者被分為兩群，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值得一提的是我們沒有訪問「轉型下的魯蛇」，這意味著 1989 年以後在資本主義轉型下的無法獲利的人。

> 爭議話題：墮胎和難民

工人階級的受訪者多數反對完全禁止墮胎，年紀大的的女性工人階級則贊成現行反墮胎法的放寬。女性中產階級通常贊成墮胎的重要，強調養育小孩的負擔昂貴。雖然我有些受訪者對反墮胎規定自由放寬方向是支持的，但是反對墮胎的聲音也很多。

大多數受訪者是反對波蘭去接收難民的。工人階級認為，難民不工作，只想獲得社會福利，強調了這樣對波蘭社會福利制度的危害，以及分配上的不公。受訪者會把難民連結上戰爭受難者，承認應該幫助他們，但是不是在波蘭幫助。樣本之中只有兩人認為接受難民進入波蘭社會不會影響到任何人，因為其實人數相當少。

有更多的中產階級受訪者認為難民代表了不同的文化，他們不願意融入波蘭和歐洲文化。很少人認為難民與波蘭的戰爭和政治動盪有歷史上的共通性。中產階級受訪者也說難民應該留在「他們自己的地方，那裡有自己的社會歸屬。」有人認為歐洲的是排他的，因此保護歐洲的「純粹」必須要求特定的宗教背景和國家的人

>>

禁止進入。有一位中產階級女性受訪者說，若難民需來波蘭，那要和波蘭社會有所隔離。

> 民主法治的破壞

波蘭政府在 2015 年 12 月開始阻礙憲法法庭。憲法法庭的任務是去判斷法律是否符合波蘭憲法。立法選舉前一個月，前政府於 2015 年 9 月的大選指派了五名法官到憲法法庭。議會多數派當時是保守自由派的 Civic Platform 和農民黨的聯盟，其有權選出三名法官，但後來五名當選。雖然法庭維持了三名 (合法選舉產生的) 法官的選舉還有宣判讓兩名 (非法當選的) 法官當選無效，但是 PiS 主導的議會提名了五名新法官，並終止法庭判決。總統 Andrzej Duda 宣誓就職的新任法官不僅導致了憲法危機，而且還導致了華沙和波蘭其他主要城市的街頭示威活動。這樣的憲法問題不是階級的，而是黨派分裂的，PiS 支持者是支持的，認為「多元化」回到了法庭。反對者則認為這些措施是對民主的傷害，成功地造就了威權政府。。

>PiS「家庭 500+」計畫

「家庭 500+」計畫於 2016 年 4 月開始，這是 PiS 政府社會政策的主力。該計畫是關於兒童福利，每個家庭有第二個和第三個孩子的話，可獲得 500 波蘭茲羅提 (約 120 歐元) (貧困家庭的第一胎也有補助)。這是後共產主義波蘭的重要政策：自 1989 年以來波蘭政府首次實施大規模的重分配，讓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受惠。

多數選民支持家庭兒童福利政策，唯一的例外是自由派中產階級認為是「政策買票」。多數中產階級是贊成的，認為是國家實力的表現。兒童福利並不奢侈，是典型的西方國家的「正常」政策，也是波蘭屬於歐盟的表現。工人階級也贊成兒童福利政策，多數表示地方政府要負責。

> 支持 PiS 的多重原因

PiS 透過通過重分配計劃來經營其政治版圖。我們的研究發現 PiS 的支持者遠比大家所所想的的更為分化。本文試圖探討這些社會差異，以及我們如和解是右派政黨的高民意支持度

我們的研究也發現，不單單是因為對於窮人的財政補助而讓其支持 PiS，還有 PiS 回應召喚了各類的需求和價值。PiS 的政治人物批評「精英」，為的是去討好工人階級。 這也關於中產階級對政治權力和社會秩序的掌控。這裡有個很有趣的發現：政治立場並不總是與受訪者的個人經歷相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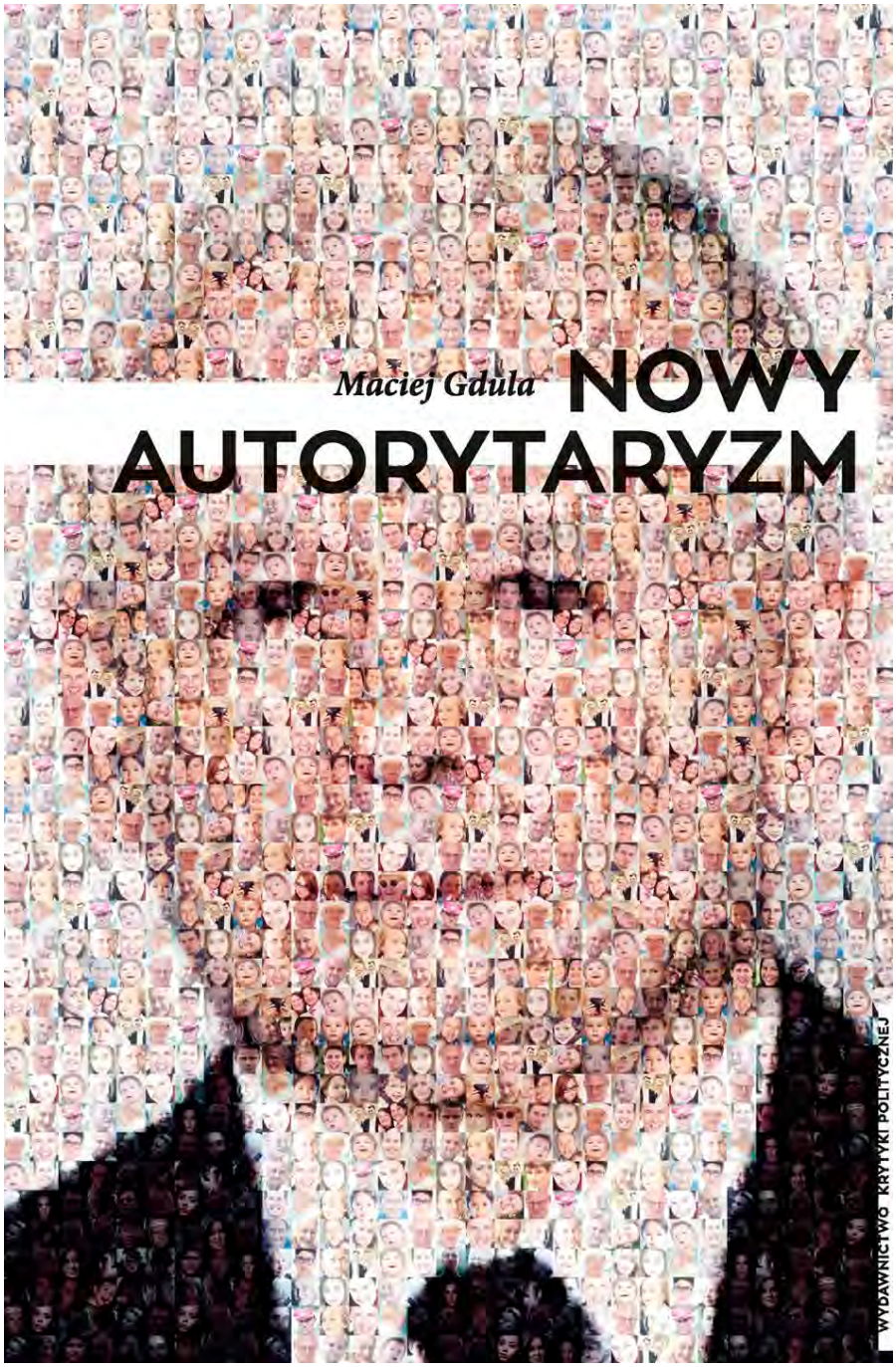
同時，PiS 用「民主」和「變得更好」的訴求戕害民主 (像是憲法法庭)。我們發現 PiS 的支持者認為自己是「民主的」，但排斥自由主義的形式，認為是自我限制。Maciej Gdula 用「新威權主義」概念解釋這種現象。根據 Gdula，現在有一種新興現象，就是「新威權主義」改變了公共領域 (網際網路類型的) 之中選民與政黨的關係。

研究結果證實我們對右派政黨的民意支持的解釋已經不夠用了。我們的研究激起了公眾的注意，引發了廣泛的公共辯論，左派和右派都知識分子都參與其中，討論波蘭社會的分裂。■

來信寄給 Katarzyna Dębska
<k.debska@is.uw.edu.pl>
Sara Herczyńska
<sara.herczynska@gmail.com>
Justyna Kościńska
<j.koscinska@is.uw.edu.pl>
Kamil Trepka
<k.trepka@is.uw.edu.pl>

> 新公共領域社會學的前景

Maciej Gdula, University of Warsaw, 波蘭



Gdula的新威權主義是公共社會學得一個好例子。

2017年11月，選舉結束兩年後，PiS（法律與司法黨）組成政府。雖然過程之中違反了許多自由民主的遊戲規則，可是還是獲得了大於40%的選民支持。對此，我撰寫了報告「Miastko的蛻變：從小鎮的窺探波蘭新威權主義」。

該報告以波蘭中部的一個小城市Miastko為對象進行的研究，並且引起了激烈的討論。辯論之中的社會與政治的議題一直發酵，有些概念已經成為討論的慣例。這其實沒有什麼，但我想講的是可能性的社會條件，因對這對於重新思考社會學在公共領域的存在，以及對於社會過程的影響非常重要。雖然這些發生在波蘭，但這不是波蘭的特例。

> 新公共領域的浮現

>>

若我們要去思考社會學的範圍，影響公共辯論，那麼，我們必須考察公共領域的近期變化。簡單來說，我們看到的是傳統新聞媒體到社群媒體的轉變。之前的公共領域是圍繞著新聞媒體而型速成的，像是「文化中介」包括 記者，專家，政治人物等等，都在公共領域中相當重要。無論是在經濟方面還是在像徵方面，網際網路的普遍性衝擊新聞媒體。波蘭的這一變遷快得驚人，像是報紙 Gazeta Wyborcza 在 2005 年 至 2017 年間流失了 75% 的讀者。

網際網路為主公共領域的內含其實相當分散。這是因為網絡很大，然後某些網站像是 YouTube 等等就會聚集很多的觀眾點閱。這些觀眾會越來越極化，產生衝突，醜聞，道德上的強烈反應。

> 中介者的弱點和社會

弱勢公共領域進入門檻降低，那麼訊息和論述的品質就可能降低或造假，真只是一種藉口，然後產生「後事實」的概念。讓媒體多元存在的方式是確定公共領域的資訊取得，並通過道德優越感和參與連結。

關於公共事務政治的討論也認同這點，政治人物成為代表激進觀點並提供可點擊量的「媒體鷹派」。

觀眾的參與相當快，交流頻繁，不過還是有一個空間去討論知識和公共議題， 因為公共論述的簡化，並且傳統新聞會燒錢。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提供對現實的解釋的社會學知識是會讓人很有興趣的，進而形塑公共領域的論述。

> 實踐真正重要的社會學

那麼什麼事真正重要社會學的原則呢？ 根據關於 Miastko 的報告，我大膽地嘗試制定一些原則。

首先，文本出現的時機是重要的。波蘭的關於 PiS 的支持來源的研究一些先前使用的解釋變沒什麼可信度的時候發表出來。像是人們普遍認為雖然 PiS 承諾與精英結攤牌，不過同時卻造就了另一批的精英，結果還更腐敗，於是背離初衷。但是這並沒有發生，PiS 仍然有 40% 的支持度。報告使用新威權主義的概念，解釋領導人在精英掌控和保衛利益中的角色。

研究要有影響，那社會過程的同步就是重要的。社會學家無法決定這一切，但我們不能忽視步調的快慢，因為快還是很重要，相關性也很重要。對 PiS 支持者的研究應該納入多點研究，增加訪談量，不過這可能的研究就是意識那這會只是歷史性的。

第二問題是與常識知識的辯證。學術論述日益複雜，研這對於一般普羅大眾而言有挑戰性。所以構建具有社會影響的知識德時候，我們必須參考廣泛的判斷，即使我們不同意。重點是不要被利用成去為不成熟，無知的論述所用，而是視為有待驗證的主觀判準。

在我對於 Miastko 的研究中，我們發現關於 PiS 支持者的有些常見的看法。其中之一為人們認為 PiS 的支持者主要是社會被排除者或是受傷者。不過訪談並沒有支持這個發現，多數受訪者在談到了自己的生活實的時候都都是討論成功的經驗。另外，我們假設 PiS 的支持者是為了感激 Family 500+ 計劃的資金 (每個人的每月收入約 120 歐元)。PiS 的選民並不以此為主要思考軸線，反而是將其詮釋為國家團結，並且波蘭最認為這項波蘭政府的計畫是有助於家庭。

第三，社會學知識應該引入複雜性的思考，這是公共領域一般缺乏的。簡化是人之常情，不過也不是總是如此。如果有知識與其經驗和相關，深化討論是可行的，那複雜化就是有意義的。例如，Miastko 的報告指出的人們對中下階級的 PiS 支持者對於精英的批評是有興趣的。對支持者而言，對精英的批評代表了精英不接地氣。對於中產階級來說，精英們已經背得了。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的波蘭公共領域對於階級的辯論。

針對這個刻板印象，人們對複雜和苛刻的內容

>>

感興趣。不過這不能僅僅是科學複雜性的再現。簡化和普及的目的是產生社會關注，引入複雜性以可以激起公共的辯論與討論。

> 社會學的角色

社會學可以讓我們從中獲得什麼，然後生產出有共鳴的知識呢？這很難，但我會試著去回答這個問題。

這種類型的社會學有機會在一種暴力和化約為至上原則的溝通文化中去平衡衝突。我們不該指責記者和政治家淪入這個地步，因為其有特定的結構限制和機會。然而，我不認為社會學不能去介入改變，好去讓公共領域的溝通更有效。

社會學的一個重要課題是為公共領域中無法發言的人發言。對我而言，為大眾普羅階級創造一個空間並呈現其生命經驗是很重要的。

第三個問題是社會學如何在公共領域與其他參與者之間定位。我認為，一個立場是與記者和政治人物的對立一樣。社會學的反思性產生的知識不同於其他類型，其自主性來自於對於社會壓力和政治衝突保持一定的批判距離。此種社會學可以透過限制定義社會現實的權力去平衡公共領域中的權力分配。■

來信寄給 Maciej Gdula
<gdulam@is.uw.edu.pl>